

叢文知求

論係關蘇日

340822

版出社版出知求

1 9 4 0



# 求知文叢第六輯目錄

本輯介紹

日蘇關係論

阿平(一一—亮)

- 一、前言 二、怎樣了解日蘇關係 三、怎樣了解日蘇關係的變化  
四、對日蘇衝突的不正確的了解 五、日蘇關係的發展 六、日本  
對蘇聯態度的幾個階段 七、日蘇改善關係的可能前途及其結果 八  
、由日蘇關係到中蘇關係

蘇聯外交政策的史的檢討

希泊(一一—三)

論青年的苦悶

徐奮(一一—三)

超然先生列傳

方生(一一—四)

第五回：美哉抗戰

## 下期預告

魯迅的思想遺產

再論日蘇關係

我怎樣發見了阿美利亞

每六輯一元八角

每十二輯三元四角

## 日蘇關係論

廿九年十月十日出版

著者 鐵聲等

出版者 求知出版社

總經理 上海五洲書報社

山東路二二一號

特約 兄弟圖書公司

四馬路三七八號

代定處 亞美書社

青島路六七號

藝文書店

靜安寺路新市場

青年圖書文具商店

戈登路二十二號

經售處 各書店各報攤

本輯定價 四角五分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 日蘇關係論

阿乎

## 一 前言

從日本統治者內部喊出改善日蘇關係的論調已經不止一次了。這次日本政府爲要改善日蘇關係，特任命退伍陸軍中將建川美次爲駐蘇聯大使，（見九月十一日上海各日報），據說：「建川之任命，與主張與日接近之蘇聯人民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的演詞相巧合，此舉當可視爲蘇日改進關係的初步」（見日本東京朝日新聞評論），傾向親蘇的建川中將亦表示「將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對於改進日蘇關係作一度傾心的談話」，並謂「日蘇須得親善，對手的外交雖屬難務，但余決心站在外交的舞台上，以背埋於莫斯科」。代表日本統治階級的各報紙對改善日蘇關係都一致贊助，並對建川使蘇抱着很大的期望，認爲這是日蘇親善的最好的時機。日本對蘇聯何「前倨而後恭」忽然的要親善起來呢？由日本人看來，這原是他們自己的事情，要怎樣便怎樣；然而也可以說，不完全是日本的事情，這與中國有關，與美國有關，與歐戰有關，甚至與整個世界有關，正因爲這樣，有了這許多的複雜現象，日蘇關係改善（？）的宣說，便迷惑了一部分

人，只看到現象，沒有看見本質，把握不住，對蘇聯起了懷疑，對日蘇關係前途存在着過分的幻想。爲了這樣，也可以說是爲着堅定中國抗戰必勝的信心，這裏，我們把日蘇關係作一番澈底，正確的透視，便更成爲有必要的了。

## 二 怎樣了解日蘇關係？

首先，我們應該怎樣來了解日蘇的關係呢？

要了解日蘇關係，我們對日蘇這兩個國家，先要有個基本的認識：

日本是個封建軍閥性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而且是個必須向外侵略的國家，並也是一個近於瘋狂的野心很大的國家（要夢想征服全世界）。她的一切對外關係，對外活動與對外政策，都是以能夠達到並符合於她的侵略願望爲目標。

蘇聯是個怎樣的國家呢？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既不封建的（而是反封建的），也不是資本帝國主義的（而是反資本反帝國主義的），她完全是屬於工農大眾的一個嶄新的國家，是與一切資產階級有分別的國家，也是與日本有分別的國家。

從國家的體系與階級性來說：日本與蘇聯的關係已經不是像日本與英國的關係或與美國的關係一樣（日與英美的關係是屬於資本主義體系的關係，發展起來，是帝國主義間的關係），日



蘇聯關係是代表着兩種不同的關係，是資本主義體系與社會主義體系的關係，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和意識處於絕對對立（但有的時候，也是暫時可以調和）的關係，是完全矛盾的關係，發展起來，這是說，衝突起來，這是表現着兩種體系鬥爭的階級鬥爭，日蘇關係的基本關係就是這樣。

要了解日蘇關係，我們還要認識蘇聯對外的基本政策，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怎樣與絕對對立的資本主義國家暫時維持和平的外交關係的外交政策。蘇聯既然與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是絕對對立的，爲什麼還要與可能和資本主義國家維持經常一般的外交關係呢？

這是因爲：第一，社會主義革命只還在一個國家內（蘇聯）得到勝利，蘇聯決不能等待周圍的國家或一切資產階級的國家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同樣成功之後，才和他們（資本主義國家）發生關係。

這是因爲：第二，不但各國社會主義的革命是個相當長期的過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蘇聯，要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沒有外面各方面（資產階級國內的工人、技師、機器、科學等等）的幫助是不行的。就是說，孤立起來去建設社會主義是不行的。

這是因爲：第三，社會主義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對立雖是基本的，但現在還不是主要的。就是說：目前還不是社會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體系非拚個你死我活的時候，也不是資本主義國家



與社會主義國家非採取對立不可的時候，因為當前還有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間的矛盾，還有資本主義與工人階級（本國的）的矛盾，還有資本主義和殖民地的矛盾，當這些矛盾，超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矛盾的時候，社會主義的蘇聯與某些資本主義的國家是暫時可以把彼此基本的矛盾隱蔽起來，為着眼前雙方的利益而和平共處，彼此相安無事的。

這是因為：第四，為着要鞏固社會主義的政權，為着要澈底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為着要培養社會主義的力量，準備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擴大（客觀環境如有可能的話），蘇聯不能不有一個長時期和平的生聚教訓。

但這又不是說：蘇聯去接觸資本主義，便要放棄社會主義（過去的托派齊諾維也夫等少數派，的確有這樣胡塗的陰謀和企圖），歡迎資本主義；便是要去和資本主義合流。所謂和資本主義接觸是要有原則的接觸，是要用社會主義的戰略與策略的方式去接觸。

早在一九一八年，列寧在著名的和平提綱裏面，就已經確定下對帝國主義國家的態度說：

「我們在兩方面（指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協約國與同盟國兩方面——作者附註）都不能完全脫離帝國主義的連系；並且顯明的，如果國際帝國主義沒有推翻，那麼，要完全脫離這種連系是不能的。這上面正確的結論應該是：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政府得到勝利以後，解放問題，不應該從挑選那個帝國主義的觀點上出發，而應該看，為鞏固及發展已經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起見，那些是最好的條件，我



們應該從這個觀點上出發去解決問題。

「換句話說：作為我們策略基礎的原則，不是我們幫助那方面帝國主義者比較有利，而是怎樣可以更正確地可靠地使社會主義革命能夠鞏固起來，或者至少使他在別的國家未加入以前，能夠單獨支持下去。」（見一九一八年二月廿四日真理報）

關於資本帝國主義不可能組成反蘇的聯合戰線，因之，蘇聯就可以利用他們（指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斯達林說：

「因為統一戰綫及資本家聯合進攻威嚇將造成一個最鞏固的環繞蘇維埃政權周圍的全體人民的大圈套，要把蘇維埃國家變成此「二十四國」進攻的時候還要鞏固的堡壘。」

「第二，因為反對蘇維埃國家的行動，在敵人的後方，一定要解開許多革命的紐結，瓦解和破壞帝國主義的行伍。」

「第三，因為我們的國家已經不是孤零零的，因為牠有四方的工人及東方的被壓迫民族做同盟者。不用懷疑，反對蘇維埃的戰爭，將成爲反對本國的工人及其殖民地的戰爭。」

「我用不着證明，假使他們進攻，我們也不會袖手旁觀，我們要採用一切方法，掀起各國的革命運動。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者不能不知道我們對那些事情是有些經驗的。（見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在莫斯科黨部積極份子會議上的報告）」

關於蘇聯本身暫時不能不與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和平的關係，斯達林說：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估計到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延遲戰爭，誘以微利，採取各種手段，以保持和平的關係。我們決不能忘記列寧所說的話，說我們的建設事業，有許多是依靠我們能否延遲和資本世界的戰爭，這種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這戰爭可以延遲下去，直到歐洲無產階級革命成熟的時候，或是最後直到資本家為殖民地的分割而自相肉搏的時候。所以和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和平關係，是我們必要的任務。」

「我們和資本主義國家間關係的基礎，是在准許兩個相反制度有共同存在的可能。實際的事實，完全證實了這點。（見斯達林：聯共中央在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但是蘇聯要和資本主義國家維持着和平共處的關係，一定先要自己有能力，否則仍是難免受資本主義國家的欺侮，故斯達林說：

「蘇聯在這一個困難的和複雜的為和平而作的鬥爭中，曾倚靠於什麼呢？」

- (一) 倚靠於自己日益增長着的經濟能力和政治能力；
- (二) 倚靠於全世界各國工人階級底無數百萬羣衆精神上的贊助，這個工人階級對於維持和平是有生死存亡的利害關係的；
- (三) 倚靠於這樣一些國家底審慎態度，這些國家由於某些動機而不願意破壞和平並想與蘇聯這樣



守信的主願發展通商關係；

(四)最後，倚於靠我們的光榮的軍隊，這支軍隊是決意保衛國家，使之免受外來的襲擊的。(見一九三四年十七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工作報告)

有了上面這許多的原因，就確定着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基本上是矛盾的，但事實上却是暫時必要和可能維持着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和共處的關係，如果是資本主義國家也願意這樣做的話。所以：

「蘇聯的外交政策是明白而容易瞭解的。」

(一)我們堅持和平，堅持與一切國度發生事務的聯系；我們堅持着而且將繼續堅持着這樣的立場，如果這些國度對於蘇聯也保持同樣的態度，如果它們不企圖破壞我們的利益。

(二)對於同蘇聯有共同國境的一切鄰邦，我們堅持和平的、親近的和善鄰的關係；我們堅持着而且將繼續堅持着這樣的立場，如果這些國度對蘇聯也保持同樣的態度，如果它們不企圖直接地或間接地破壞蘇聯國境的完整和神聖不可侵犯的利益。

(三)我們堅持援助一切因爭取祖國獨立而成了侵略行爲的犧牲品的民族。

(四)我們不怕侵略者方面來的恐嚇，而世對於企圖破壞蘇聯國境的神聖不可侵犯的那些戰爭——**掠奪者準備以雙倍的打擊回擊他們的打擊。**

這便是蘇聯的外交政策。」（一九三九年斯達林：「在聯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的工作報告」）

根據了這一切的材料，我們可以把蘇聯對外關係基本政策歸納於下：

第一，是和平政策，與資本主義國家暫時維持和平共處（基本上是對立的）的政策。這個和平政策完全有別於帝國主義的和平政策，帝國主義的和平政策是爲的帝國主義利益的政策，彼此的目標是不相同的。

第二，是謀與資本主義國家維持平等互惠的商業關係的。如果對方也願意。

第三，是反對侵略的，同情與援助一切被侵略的民族。不管這侵略的國家是那一個國家。

第四，是反對帝家主義戰爭的。願參加一切足以制止帝國主義戰爭爆發或擴大的和平（軍事性的）合作，而在帝國主義的戰爭中嚴守中立。

蘇聯站在這種對外政策的基礎上，願意去和一切體系不同的國家（連日本也在內）發在友好的關係，蘇聯也是抱着這種原則去和日本發生關係，有原則的與日本發生外交上的關係，這就是蘇聯對日本所要維持着的關係。儘管蘇聯與日本在外交上的關係所表達的現象是怎樣的複雜曲折，而蘇聯對日本所要維持關係的原則上的本質是不變的。日蘇關係的本質就是這樣。



### 三 怎樣了解日蘇關係的變化

蘇聯對日本所要維持的日蘇關係既如上述，這裏，所謂日蘇關係的變化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日蘇關係的變化，應該了解為日本對蘇聯的關係發生了變化，不是蘇聯對日本的关系發生了變化（蘇聯對任何一國的和平原則是暫時不會變的，這個「暫時」是相當長時期的一個「暫時」，是非為資本主義體系到最後衝突不可以以前的「暫時」）。

這就是說，日蘇關係的變化，是當蘇聯願意與日本發生原則上的友好關係的時候，日本不同意與蘇聯發生這樣的關係，日蘇關係才起了變化，是起了不符合蘇聯和平原則的變化。

這就是說，日蘇關係的變化，是日本對蘇聯的關係不好，不是蘇聯對日本的關係不好，是由於日本的反蘇，却不是因為蘇聯的反日，是日本要進攻蘇聯，不是蘇聯要侵略日本（過去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這更就是說：日蘇關係的變化，由變化而引起的許多問題，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上的衝突問題，是日本方面挑起來的問題，是要由日本方面首先負責問題發生後的責任；而並不是由蘇聯挑起來的問題。

然而日蘇關係的變化，不僅有壞的方面的變化，同時也可能有好的方面的變化，例如新近日

日本忽然打算要把過去不好的日蘇關係改善起來。這在日本對蘇聯的關係來說，自然是一個變化，但這變化的只是日本，這種變化並不能影響蘇聯和平外交原則上的變化。蘇聯仍然只是盼望與日本恢復原則上的友好關係，日本要和蘇聯改善關係，決不能超過蘇聯原則上的限度以內，否則除非是：日本已放棄符合於帝國主義利益的侵略政策（關於這點，如不是革命的日本是做不到的）。

故所謂日蘇關係的變化，是日本是否願意與蘇聯維持和平共處的關係的問題，是由於日本對蘇聯的態度是否發生了變化，好的變化或者是壞的變化。儘管日本在外交上對蘇聯作種種不同的姿態，做許多不同的宣傳，而是五花八門的現象，但蘇聯和平原則的本質是不變化的。

對日蘇關係變化的了解，就是這樣。

#### 四 對日蘇衝突底不正確的了解

另外還有一些經常聽到的對日蘇衝突底不正確的了解，這種不正確的了解對於觀察和分析日蘇的問題是有害的，是會得不到正確的結論的。

是那些不正確的了解呢？

這第一個不正確的了解，就是把日蘇衝突認為是宿命的對立，是由於帝俄時代積下來的歷史



上的世仇。其實帝俄時代的仇恨早已結束了，早已跟着帝俄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制度結束了，現在是社會主義的蘇聯是一個與人無爭，願意和平共處的蘇聯。假如說：日蘇衝突，是帝俄時代衝突的繼續，我們能說當日蘇參與十四個帝國主義反共十字軍，出兵佔領西伯利亞與海參崴的時候，是爲了歷史上的世仇嗎？顯然不是的。

這第二個不正確的了解，就是把日蘇衝突認爲是由於彼此邊界太長，地理上過於接近，因之，時常發生邊界糾紛的衝突。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事實上過去一切邊界或地理上的糾紛，都是由日本方面引起的，不是由蘇聯方面引起的，這如同許多其他方面的衝突，都是由於日本方面所引起的一樣。

舉幾個例：

一個是過去日蘇因爲中東路而引起的衝突問題。「關於中東路問題談判底停頓，也應該這樣說，這種停頓不是由於蘇聯方面引起的；同樣，關於日本的代辦們在中東路上幹出不可容許的事情，非法地拘捕中東路上蘇聯職員等等，也應該這樣說」。（見斯達林：「十七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工作報告」）

一個是去年蒙滿邊界有名的在諾門罕衝突的問題。「大家知道，衝突之所以發生，是因爲日本企圖攫取蒙古人民共和國一部分領土，並這樣來以暴力改變蒙滿疆界以利於自己」。（見莫洛



托夫一九三九年十月在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第五屆全會會議上的報告)

這第三個不正確的了解，就是把日蘇衝突認爲是彼此在遠東要互相擴張勢力的結果。這說的更是籠統模糊。爭霸權，爭殖民地，這是屬於帝國主義世界競爭範圍以內的事，我們可以說，這是日本方面的事，却不是蘇聯的事。日本有在遠東的大陸政策，有所謂南進北進的政策，還要設「東亞新秩序」，同時「日本的一部分軍人在出版物上公開鼓吹必須與蘇聯戰爭，和必須奪取蘇聯底沿海州，同時另一部分的軍人却顯然同意這點，而日本底政府呢？並不去約束挑撥戰爭底人，反而做出樣子，似乎這與牠無關。」(斯達林「十七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工作報告」)而蘇聯却是沒有侵佔日本任何領土的計劃，沒有必須和日本戰爭的表示。蘇聯一切在遠東方面的軍事設施，全是爲着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防禦。故事實上在那裏擴張勢力的，是日本不是蘇聯，是日本因爲要擴張到侵犯蘇聯利益的勢力，這才發生了衝突。至於也許有人要說：蘇聯所要擴張的是革命勢力吧？然而革命是不能依照着主觀的意志去擴張的。革命的產生，「是只有當着這些國家的革命者，覺得可能或者需要的時候，革命方能產生。如果以爲革命可以輸出的話，——這就是胡說。每一個國家倘若願意革命，他們就用自己的力量進行自己的革命，倘若不願意，也就不會「有革命」。(一九三六年三月斯達林與霍華德底談話)。

這第四個不正確的了解，就是把日蘇衝突認爲是由於蘇聯的赤化宣傳。故「又有人說，是俄



國布爾塞維克的宣傳，妨礙確定「正當的」關係。爲了要提防布爾塞維克有害的宣傳，資產階級的老爺們用「哨兵線」和「鐵絲網」把自己保衛起來，而把看守「鐵絲網」的官職，很慈愛的交給波蘭、羅馬尼亞、芬蘭等國。……他們亂喊布爾塞維克的宣傳，不是爲着要確定「正當的關係」，而是一種宣傳武裝干涉的藉口，這還待證明嗎？他們如果不願意作可笑的人，怎樣會自己「用電網隔起來」，以「提防」布爾塞維克的思想呢？難道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內，沒有合於這種思想發展的基礎嗎？沙皇政府當時也曾經「這樣隔起來」，「提防」布爾塞維克主義，但是人人都知道，他是沒有「提防」得了的。他所以沒有提防得了，是因爲布爾塞維克主義到處發展不是從外而來的，乃是從內而來的」（斯達林：「聯共十六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

這第五個不正確的了解，就是把日蘇衝突認爲是某些個別問題上的衝突，如邊界衝突，北洋漁業問題的衝突，及庫頁島煤油開採問題的衝突等。這些衝突決不是偶然的衝突，每一次的每種的衝突，都包含着有反蘇陰謀的必然性，換句話說，凡是損害着蘇聯利益的，客觀上必然是以社會主義的，是隱藏着一個社會主義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間的鬥爭，而不僅是一個簡單問題上的鬥爭。

那末，什麼是日蘇衝突底正確的了解呢？

對日蘇衝突的唯一正確的基本上的了解，是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不是



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他是整個資本主義與正在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間的一種矛盾，這種矛盾動搖與破壞了資本主義本身的基礎。不僅這樣，由於這種矛盾，把資本主義所有的矛盾都揭穿到底，並把這些矛盾積成一團，使他們變成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所謂「誰戰勝誰，一切中心問題就在這裏」（斯達林語），所以「當資本主義矛盾每次開始緊張起來的時候，資產階級總眼望着蘇聯，企圖在蘇聯的賬上來解決資本主義的某個矛盾，或資本主義所有的一切矛盾，因為蘇聯是革命的大本營，他的存在，就使工人階級和殖民地革命化，他妨礙進行新戰爭，妨礙重新瓜分世界，妨礙統治廣大的蘇聯市場，而這種市場，因經濟恐慌的原故，現在對於資本家是特別需要的。由此，就生出對蘇聯的冒險行動和干涉的趨勢，這個趨勢，因經濟恐慌的擴展更要加緊」。〔斯達林：「聯共十六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這就是說，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種種（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不穩，更增加着對這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仇視——含有階級性的仇視。

一切的問題就在這裏：儘管日蘇的衝突，表面的原因很多，日方所宣稱的理由是怎樣的振振有詞，而本質只有一個這就是日本對蘇聯的階級成見與階級仇視。

## 五、日蘇關係的發展



日蘇關係的發展，就是說，日本對蘇聯的態度忽好忽壞，這現象的發生不是孤立的，是要由這現實世界裏許多的聯系和因素來決定的。

日蘇關係的發展，是要由下面的許多因素與聯系來決定：

第一，是蘇聯在日益生長着的力量（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力量），特別是軍事方面的力量。因為「資本主義世界都有現代的技術的武裝，——沒有這個，國家的獨立是不能的；沒有這個，我國（指蘇聯——作者）便變成了國外的敵人的戰爭活動的目的物。那時我國的地位，或許和中國差不多，自己既沒有重工業，也沒有軍事工業，只好任人宰割吧了。」（斯達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因為蘇聯已有了很強大的海陸空紅軍，因為蘇聯已於幾次在敵人企圖進行反蘇戰爭中表示了她的力量，這樣，就要使日本考慮一下，進攻蘇聯是否有必勝的把握。

第二，是日本進攻蘇聯的力量。日本原是仇視蘇聯的，是要準備對蘇作戰的，因為依照田中奏摺內所說：「爲了取得北滿資源而與俄國在蒙古交戰的必然性，正是我們國家（指日本——作者）發展程序的一部分。……我們遲早必須對蘇俄開戰。……」這就是：日本力量如超過了蘇聯力量時，日本也是會對蘇聯採取敵對的行動的。日本的這種進攻蘇聯力量不僅決定於日本與蘇聯兩種力量的對比，並還要決定於日本與蘇聯外部聯系力量的對比。

第三就是蘇聯與全世界工人聯系的力量。「各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們的同情和擁護蘇聯，蘇

聯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威力的增大，蘇聯在國防上力量的加強，蘇維埃政權所堅決執行的和平政策，這些，都是鞏固蘇聯國際地位的元素。」（斯達林：「聯共十六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

第四是蘇聯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聯系，特別是與現正在進行民族革命戰爭，反抗日本侵略的中華民族的聯系。中蘇的密切合作，給與日蘇關係的發展，自然是有極重要的影響的。

第五，是蘇聯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系。這例如過去法蘇的聯系（蘇法簽訂互助公約的時候），現在的德蘇聯系（當法蘇互不侵犯條約一成立，日蘇邊境的衝突立即停止）與今後英美蘇間的聯系。

第六，是日本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系。當德蘇接近的時候，日本因為接近德的關係，也不能不與蘇聯比較接近；而當目前日本決心在太平洋上與英、美採取敵對行動的時候，日本為要專心對付英、美，更不能不與蘇聯作進一步關係的改善。更不可能去作任何反蘇聯利益的企圖。

第七，是日本內部的矛盾。就是當日本革命力量日益擴大起來的時候，日本統治者忙於鎮壓內部的時候，日蘇間緊張的關係可能暫時的和緩下來；但當日本內部革命力量能够影響到政治改革的時候，日本對蘇聯關係也又可能的好起來。



第八，是日·本·與·中·國·戰·爭·的·聯·系·，日本如能够澈底完成征服中國的計劃，日本有可能進攻蘇聯，與蘇聯關係日益惡化起來；相反的，日本如不能迅速結束中日戰事，日本在中國的泥足愈陷愈深，日本便沒有同時反蘇的力量，日蘇關係縱不能改進，也不會怎樣的變壞。

總結起來，日蘇關係的發展，是由四個基本的矛盾來決定的，這四個矛盾是：

一個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間的矛盾；

一個是帝國主義與蘇聯的矛盾；

一個是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矛盾；

一個是帝國主義內部與工人的矛盾。

這四個矛盾都是互相影響，互有決定作用的，這四個矛盾的發展與某幾個矛盾的特別的發展，完全是要由主觀與客觀的條件來決定的。這種矛盾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是依照着辯證法的方式進行的，我們只有運用辯證法才能把握着這四個矛盾的發展，把握了這四個矛盾的發展，才能把握着日蘇關係發展的方向。

## 六 日本對蘇聯態度的幾個階段

在日蘇關係的發展中，日本對蘇聯的態度約分爲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是：

第一·個·階·段·，·是·日·本·軍·事·干·涉·蘇·聯·革·命·的·階·段·。

這個階段也就是有名的帝國主義者共同軍事干涉蘇聯革命的時期。干涉的原因，是由於「協約國帝國主義者確信蘇維埃政權的不鞏固，他們深信，只要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稍加努力，則它的傾覆是必然的」。「因之協約國政府決定了開始在俄國實行軍事干涉，用以推翻蘇維埃政權和建立資產階級政權，這個政權應該恢復資產階級的秩序，取消對德和約，重建反對德、奧的戰線。」「這樣形成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外國的軍事干涉，而得到了蘇維埃政權底俄國內部敵人底反革命叛亂底擁護」。「這樣，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就形成了兩種一定的力量，準備來推翻蘇維埃政權。外國的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及俄國內部的反革命。」（見聯共黨史簡的教程中譯本）日本就是參加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對俄作軍事干涉者之一，當時「英法的軍隊在俄國北部登陸，佔領了阿爾漢格爾斯克及穆爾孟斯克，幫助了那里白黨的叛亂，推翻了蘇維埃政權並創立了白黨的「北俄政府」。而同時「日本的軍隊在海參崴登陸，佔領了濱海省，驅逐了蘇維埃並幫助白黨的叛變，以後恢復了資產階級的制度」。（見同上書）日本在遠東的干涉一直繼續到一九二二年，這就是說，日本最後被迫退出了西伯利亞，回去了自己的老家。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紅軍佔領了海參崴——這帝國主義干涉者在蘇維埃土地上的最後的城堡。日本直接軍事干涉蘇聯的階段於以告終。



第二個階段是日·本·與·蘇·聯·比·較·的·相·安·無·事·及·和·平·共·處·的·階·段·。

這一個階段是反映着戰後世界資本主義轉入相當穩定的階段，同時也是蘇維埃制度穩定的階段。「所以我們有兩個穩定：資本主義暫時的穩定及蘇維埃制度的穩定。在這兩個穩定間達到了某種暫時的平衡，這就是我們所處的國際情形的特點。」（斯達林：「聯共十四次臨時大會工作底總結」）因為蘇聯和資本主義體系「達到了某種暫時的平衡」，所以能和資本主義的國家（連日本也在內）暫時相安無事。

這個資本主義穩定的具體表現：「第一，在於美國、英國、及法國關於掠奪德國的方法及範圍得到暫時的同意」。「第二，資本主義的穩定表現在英國、美國及日本的資本在中國關於劃分勢力範圍，關於在這個國際資本主義的廣大市場中，掠奪的方法得到了暫時的同意」。「第三，資本主義的穩定表現在先進國的帝國主義者的集團間關於不互相侵犯掠奪和壓迫「他自己的」殖民地的事情得到暫時的同意」。（見同上斯達林語）

但是，沒有疑問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穩定，暫時加緊了資本的力量，同時必定加緊了資本主義的矛盾：甲、各國帝國主義集團的矛盾；乙、各國工人和資本家間的矛盾；丙，帝國主義和各國殖民地民族間的矛盾。」（見同上）因為這樣，不久世界資本主義就由暫時的穩定走入了經濟危機，於是在這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制度間失去了某種暫時的平衡」，立即由與蘇聯



相安無事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基本上仍是對立仇視的），轉入了重又進行反蘇陰謀的時期，這樣，也就把東方的日本推進到對蘇聯態度的第三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是日本在東方追隨英國之後，參加並準備反蘇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日本還不是東方反蘇的主要角色，主要的角色是大英帝國，日本不過是聊附驥尾。故在這一階段日蘇關係說不上好，但也不十分壞，大英帝國是這一階段在東方做反蘇的領導人。這個階段是如斯達林所說的：「帝國主義營壘中干涉蘇聯傾向的增長，和戰爭的危險（對於蘇聯），是現在政局上最主要的事實之一。」爲什麼帝國主義又有了干涉蘇聯的傾向呢？這是因爲從資本主義的穩定上，發生着更擴大的資本主義的危機。斯達林曾又這樣的說過：

「資本家們希望壓服蘇聯，希望他轉變到資本主義，希望蘇聯的威信在歐洲工人和殖民地勞苦羣衆中低落下來，結果，這些希望都烟消雲散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興發起來。他在全世界工農中的影響和信仰，發展並鞏固起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的存在，本身就是在歐洲和殖民地上毀壞世界帝國主義，破裂他的穩定底最大原素。蘇聯很明顯的成爲歐洲工人階級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旗幟。所以，爲將來帝國主義大戰肅清障礙起見，爲更徹底地壓榨「自己」的工人階級及壓制「自己」的殖民地以鞏固資本主義的後方起見，應該先征服蘇聯，因爲她是革命的源泉和革命和播揚者，並且以前曾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最大商品市場。因此，帝國主義者干涉蘇聯的趨向的活躍，孤立蘇聯的政策，包圍



蘇聯的政策，準備和蘇聯戰爭條件底政策」（聯共中央在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假使二年前，可以說及並且應該說及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間相當平衡和『和平共處』的時期，那麼，到現在我們有充分的根據，可以說『和平共處』的時期已成過去了，而代之以帝國主義者猛烈前進，預備干涉蘇聯的時期」。（見同上）

爲什麼在這一階段的反蘇、英國是最積極的呢？這是因爲「在資本主義恐慌前進的境遇中，英國資產階級是最受危險，最受苦難的一個國家，所以她是企圖武裝干涉的主動者。」（見同上）在這一階段內，由英國領導反蘇的運動有着如下的事實：「爲蘇聯工人幫助礦工（指英國的——作者）罷工的事件的英國通牒，在天津、北京、上海等處的搜捕，對於阿爾考斯（蘇聯在英國的商務機關——作者）的搜查，英國和蘇聯國交的斷絕，伏以柯夫的被刺，英國走狗在蘇聯的恐怖行動」。又「譬如英國保守黨內閣與蘇聯的絕交與中國軍閥的奪取中東路，財政上封鎖蘇聯」。

第四個階段是日本直接反蘇充當反蘇先鋒與蘇聯經常發生糾紛及軍事衝突的階段。

這個階段是日本反蘇最勇與日蘇關係最惡化的階段。日蘇關係的走入緊張惡化是開始於一九三一的佔領東北。「一九三一年以來擴大的日本侵略的戰爭，樹立了對『滿洲國』熱河，察哈爾和內蒙古的軍事統治，同時也樹立了侵略外蒙古和蘇聯的基礎，爲了進攻蘇聯，軍事上的準備是正在積極地推進着」。而日本「由於這種野心，因此對於蘇聯一再提出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終



是不斷予以拒絕。據軍部份子的半官文件中任意的表示，日本以蘇聯為犧牲的領土擴展的目標，是針對了遠東省蘇屬的庫頁島，堪察加，外蒙古以及——在更野心的計劃中——到貝加爾湖為止的全部東西伯利亞」。（見英杜德：世界政治中譯本）

在這一階段中，常成爲日蘇關係惡化中的表面原因的有着下面的這幾個問題：

一個是中東鐵路問題。中東路有一大部分是在東北的境內，日本用武力佔領了東北後，同樣也想用武力佔據着中東鐵路，因之，關東軍及東北的日本特務機關用盡一切的卑劣手段，積極破壞中東鐵路的行政措施。蘇聯爲着避免戰爭的危險，結果與日方議定，將該段鐵路售與偽滿，這樣，雖然把因中東路而發生的緊張空氣暫時的和緩下來，但日本並不忠實的依照協定付款這事件仍是一直的糾纏不清。

一個是北洋漁業的問題。什麼是北洋漁業的問題？一九二五年一月日蘇訂立國交協定接着不久就簽訂了一個北洋漁業協定，在這協定裏，蘇聯承認日本漁民在北洋有投票納租捕漁的權利。這個漁業問題的發生，是日本企圖永久地不付代價的獨佔北洋的一切捕漁權，並主張在北洋區域內以及在內河（如黑龍江）上的蘇聯漁輪也應停止工作。這企圖達不到，日本就向蘇聯要求廢止競賣制度，因爲日本競爭不過蘇聯的漁業國營，後來日本又向蘇聯要求國營漁區與日本所有的漁區數目應相等，這點也爲蘇聯所拒絕了。於是日蘇間經常爲着捕魚問題。



一個是北庫頁島的煤油問題。同樣最初蘇聯與日本簽訂着一個北庫煤油協定，規定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起，蘇聯給日本在特定的八個地方採掘四十五年，另外十一處有試掘十一年的權利，但日本必須服從蘇聯國內一切法律並支付一定的租金和稅款。問題的發生是日本的試掘煤油權滿期之後，日方不但希望把試掘權延長，並想永久的獨佔，幻想用廉價來收買這個油島。此外在該島上使用日本工人與蘇聯工人亦經常發生了問題。

一個是日蘇邊界的問題。實際上是「滿」蒙（外蒙）邊界與「滿」蘇邊界的問題。「滿」蘇的邊界是從圖們江口直到滿洲里的西面，長約四千三百餘公里，加上「滿」蒙的邊界線，約共長有五千公里。爲着邊界劃線，從發生問題到現在，發生着的邊界糾紛，約有三四百次（從最大的到最小的），這個邊界問題，日蘇開始終是無法解決的，因爲有些邊界是蘇聯不能同意的，如同意了這些邊界，就等於同意了日本侵佔東北，承認了中國現狀。日蘇邊界的糾紛，也許是延長到中日戰爭結束後作一個最後的總解決吧！

遠的不說，單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日反共公約成立，日本加入了德、意軸心以後的日蘇關係來講，日蘇關係的愈趨惡化，有着如下的許多事實：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九日中國國民政府發表締結中國互不侵犯條約，日政府對蘇大肆攻訐。

一九三八年一月廿六日蘇聯通告中止收受寄往日本及寄自日本的小包郵件。

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蘇聯通告封閉神戶總領事館。

一九三八年五月廿二日，日蘇在瑣春發生軍事衝突。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張鼓峯事件爆發。

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二日，蘇聯封閉伯力，海蘭池日本兩領事館，日外務省提出抗議。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諾蒙亨日蘇兩軍發生衝突。

一九三九年六月廿七日，日蘇空戰。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東鄉大使因漁業問題向蘇提抗議。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五日，在庫頁島日蘇發生衝突。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階段內的日蘇關係的惡化，全是由日方造成的；相反的，蘇聯仍是一本和平政策，希望與日本改善關係，這從斯達林，和莫洛托夫的報告中證明了這一點。

一九三四年一月斯達林在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工作報告中說：

「當然，我們以後也將斷然進行和平政策和力謀與日本的關係改善，因我們希望這些關係底改善，但這裏並不是一切都以我們為轉移的。」

「日本需要互不侵犯的條約的程度並不次於蘇聯，而日本却拒絕訂立互不侵犯的條約，這件事實，再一次證實，在我們彼此間的關係上，並不是一切都順暢的。」



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莫洛托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第五屆全會會議上的報告裏說：

「近來在蘇日關係方面有某種程度的改善。這種改善，是從不久以前莫斯科協定成立時開始顯露出來的，由於這個協定的結果，蒙滿邊界上所有各衝突，已被結束了。」

「除此而外，還查明了有着手進行關於蘇日通商問題談判的可能。不可不承認，發展蘇日貿易關係，也是適合於兩國雙方利益的。」

一九四〇年三月廿九日莫洛托夫在第六屆最蘇維埃會議上的報告中說：

「關於吾人與日本之關係，吾人曾經相當困難解決若干問題，此是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簽訂之蘇日漁業協定，及日方允付中東路最後一次拔款事實加以證明。雖然，吾人對蘇日關係，殊不能表示滿意，截至目前止，去年發生衝突地點劃界問題仍未獲解決，日方對中東路最後一次之拔款雖已償付，但對於吾方利用該款，仍多方留難；同時，蘇聯駐日及駐「滿」代表所受日當局之待遇，極為不正常。時至今日，日本應明瞭蘇聯決不容忍任何破壞蘇聯利益之行動，非俟日方完全認識此點，蘇日關係無法獲得滿意的發展。」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日，莫洛托夫在聯邦院及民族聯席會議中報告政府的外交政策又說：

「就大體而言，日方似有改善關係之傾向，苟雙方均能認識除去障礙之必要，則日蘇關係之改進，並非不可能。」

第五個階段，就是日本對蘇聯傾向改善日蘇關係的現階段。

我們可以這樣的說：一九三九年八月間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是日本企圖改善日蘇關係的起點，這是因為從這時候起，德意日軸心的防共協定破了產，事實上日本已經沒有了單獨反共的力量了。這個階段反映於日本內部的；是親英美的米內內閣的倒台，德意軸心派的沒起，近衛重新組閣，對內擬進行新政體，換句話說，就是更法西斯化的獨裁政體；對外則外交政策的新檢討，駐外使節的大事更動。駐蘇大使由建川來代替東鄉作為改善日蘇關係的初步。然而日本由反蘇忽而改為親蘇的現階段，可以說，不過是一種舊陰謀的新花樣而已，詳情容在後面討論。

日本對蘇聯的幾個階段的態度就是這樣。

## 七 日蘇改善關係的可能前途及其結果

現在我們要問：日本為什麼忽然又要改善日蘇的關係呢？這種日蘇關係改善的可能，前途及其結果又是怎樣呢？

因之，由目前日本企圖改善日蘇關係立即引起了下面的許多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日本要改善日蘇關係的原因。

日本企圖改善日蘇關係的第一原因是幻想結束「中國事件」。東京報紙日日新聞九月十日社



評謂：「蘇日關係之改進乃屬需要之事，因避免邊境衝突後，日本可戮力解決『中國事件』及實現南進政策。——如無蘇聯同意，『新東亞主義』將不能成立」（見上海九月十二日各日報合衆社東京十一日電）。而上海的新申報亦稱：「日俄關係的明朗，就是淪府瓦解的先聲，總而言之，抗戰的路線快要不通了，全面和平的實現，不過僅是時間問題罷了」。這可見日本對這次企圖改善日蘇關係的懷抱是怎樣的大！

日本企圖改善日蘇關係的第二個原因，是擬乘歐戰機會，實行南進，就是說，企圖侵佔英、美、法、荷屬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但既要南進，便不能同時進與蘇聯發生衝突，便必須在東北的「滿蘇邊界維持和平的關係，故日本報紙報知新聞說：「日本爲成立遠東大集團起見，將變更其南守北進之傳統政策，倘日本能調整對蘇關係，避免再度發生張鼓峯事件及諾蒙漢事件，日本將運用全部力量解決此項問題。」

日本企圖改善日蘇關係的第三個原因，不僅是在與蘇聯在「滿」蘇邊界的和平，俾可專力南進；而且爲的也不讓蘇聯與英美接近，換句話說，就是要破壞美蘇的合作。美蘇合作的未來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要在太平洋阻止日本的南進。日本爲着要先發制人，故在外交上首先自動的向蘇聯表示了親善的傾向，首先企圖破壞美蘇的合作，這是日美間的一個外交上的鬥爭。

日本企圖改善日蘇關係的第四個原因，爲的就是要加強德意日軸心。據九月十三日上海各報



載海通社十二日東京電謂：「此間人士，評論建川中將繼任駐蘇大使，以爲日蘇兩國，必須合作，而日本對軸心國家之關係，亦應增強」。但就上海九月二十八日報紙披露的消息稱：德意日三國，已經進一步的訂立軍事經濟同盟了，並在該同盟條約第五條內申明：「德意日三國申明上述條款，並不影響簽字國與蘇聯之現行政治關係」。這就是說，日本今天的加強德意日軸心，不能反對蘇聯，這因爲在地理上來說，西伯利亞鐵路是日德意聯系的重要紐帶，這樣，爲要加強德義日軸心，就同時非改善日蘇的關係不可。

日本企圖改善日蘇關係的第五個原因，也是想要解決日蘇間的一些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據東京報知新聞說：「目前日蘇兩國間之重要問題，如庫頁島北部之煤及煤油問題，滿、蒙商約問題等項，均未解決，建川之使命，甚爲重要，但歐戰發生，日蘇關係，頗見增進，上項問題之解決，不致發生重大困難」。

第二個問題，是日蘇關係的改善，可能做到怎樣的程度的問題。

日蘇關係改善的結果，第一個可能是部分的解決了日蘇間的懸案。前面我們已經說過，日蘇間的懸案，有些是目前不能解決的，然而部分的解決是可能的，故莫洛托夫曾說過：「苟雙方均能認識除去障礙之必要，則蘇日關係之改進，並非不可能」。這所謂「障礙」是什麼呢？就是日蘇間久延而未解決的一些重要的懸案，例如在某些地方的劃界問題，就是日蘇間的重要懸案之



一，所以莫洛托夫說：「去年（指一九三九年——作者）在哈爾欣河發生衝突區域確切劃界問題，雙方已於六月九日成立協定，此點極為重要，蓋此事之延不解決，已使蘇日及滿蒙關係之調整，發生阻礙也」。（見一九四〇年八月二日莫洛托夫在聯邦院及民族院聯席會議中的外交報告）解決某些懸案同時也是蘇聯的願望，故日本真是誠意要改善日蘇關係的話，日蘇間的部分的障礙」的除去是可能的。

日蘇關係改善的結果，第二個可能是相當的增進日蘇間的貿易關係。蘇聯並不反對與任何資本主義的國家通商，因為「發展蘇日貿易關係也是適合於兩國雙方利益的」（莫洛托夫語），至於日本是不是也需要改善與蘇聯的貿易關係呢？是需要的，而且很迫切的需要，爲了此事，日本特別派了一個商業考察代表團到莫斯科去，企圖與蘇聯作爲談訂商約的初步，可是並沒有成功。在今年四月九日上海各報曾登載過兩則這樣的消息

「日本派赴蘇聯與蘇聯政府談判締結日蘇新商約之商業考察團，昨日離莫斯科返日，空手而返，日方曾將該國意見繕成草稿，提交蘇聯，然未經蘇聯方面之接受。此後締結新商約談判仍將繼續，惟須經過通常外交途徑，由日本駐蘇聯大使館與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辦理云」（合衆社莫斯科八日電）

「據此間消息靈通人士宣稱：蘇日經濟談判現已中斷，按該項談判，係去九底所開始，其目的在締組一九四〇年之商務清算協定。現悉日本代表團團長松島已奉委駐瑞典公使，將赴瑞典呈遞國書，其餘



團員均於昨日首途返國」。(海通社莫斯科八日電)

由此可見，日本是需要與蘇聯簽訂商約的，而這個商約是經常的在談判的，談判成功的關鍵是在這個商約符合兩國雙方的利益，是在平等的互惠。

日蘇關係改善的結果，第三個可能是簽訂互不侵犯協定。據九月廿八日合衆社東京電稱：「日本自與德義簽訂公約後，其官方之注意力今日似已轉向於蘇接近一點，日本官方似頗願與蘇聯締結一種與德蘇協定性質相同之協定」。(見九月廿九日上海申報)這裏所謂「與德蘇協定性質相同之協定」就是互不侵犯協定。現在要問：日蘇間簽訂一個這樣的協定是可能的嗎？我們的回答：是可能的。爲什麼呢？這是：第一，因爲在客觀上蘇聯雖然並不怎樣需要這樣的協定（這爲的蘇聯已經強大，已「不怕侵略者方面來的恐嚇，而且對於企圖破壞蘇聯國境的神聖不可侵犯的那些戰爭挑撥者，準備以雙倍的打擊回答他們的打擊」——斯達林語），在主觀的外交原則上，却是不反對與任何國家簽訂互不侵犯協定，這只要「如果它們不企圖直接地或是間接地破壞蘇聯國境的完整和神聖不可侵犯的利益」（同上史達林語）的時候，蘇聯是願意的這樣做的，因爲這是符合着蘇聯「堅持和平的，親近的和善鄰的關係」。第二，因爲日本在主觀上雖然不喜歡共產主義，不願意與蘇聯過分的接近而簽訂這樣的協定；但日本在今天客觀的情勢上，却是很需要這樣的協定，今天日本需要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協定是超過了蘇聯的需要的。這是爲什麼原因



呢？一個原因是今天的蘇聯不怕日本的威脅（一半是蘇聯有備無患，一半是日本力量消耗在中日的戰爭中，已無力反蘇），而日本到是怕蘇聯的威脅（邊界上隨時有引起糾紛的可能）。另一個原因是太平洋上的日美爭霸，日益走向由經濟對立（美國禁運油類）到軍事的衝突，日本不可能將中日戰爭，日蘇戰爭與日美戰爭在同一個時候進行。不過日本為要達到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先要努力除去日蘇間的一世障礙，這就是說，首先要解決日蘇間部分重要的懸案；其次，是要能夠訂立一個平等互惠的商約，如果這些障礙沒有除去，日蘇互不侵犯協定定的簽訂是不可能的。

有人提出蘇聯幫助中國進行反日的戰爭，是否會妨礙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呢？我想是不會的。在最近德意日三國所訂立的軍事經濟同盟第三條不是說過嗎？「德、意、日三國同意根據上述方針合作努力，倘簽字國之一，遭歐洲戰爭或中日戰爭目前尚未牽涉之國家之攻擊，三國當在政治，經濟，軍事之方面互相援助」。這一條施用於遠東中日戰爭的意義就是說，凡過去已經牽涉到中日戰爭的國家，這個國家就是懷有任何（間接或直接）攻擊日本的敵意的，德、意、日不管賬。很明顯的，德意日同盟第三條的訂立，是為着要避免蘇聯作敵意的對立，因為蘇聯的公開以武器援助中國是舉世皆知的事實；而日本現在所希望了蘇聯的，是在未來太平洋上美英日的戰爭中，採取中立（事實上蘇聯必然不會參加任何帝國主義的戰爭的，但如果沒有條約上的保障，日本是不放心的）；並不是要蘇聯在中日戰爭中採取中立（這一點，在日本方面也知道不可



能)當然，日本的主觀上是希望蘇聯不要幫助中國的，而且也是深恨蘇聯的幫助中國的，但在日本今天當着兩個大敵，美國與蘇聯之前，不能不先對付目前主要的敵人美國，而將目前次要的敵人蘇聯暫時的化敵為友，聯蘇如不能達到完全目的(對付美國同時打擊中國)，就是能夠達到部分的目的(對付美國)也是好的。這是日本外交上的戰略，這個戰略完全為蘇聯所知道，這在蘇聯只要符合着蘇聯社會主義的利益，是願意接受不管懷着什麼目的或戰略來作親近蘇聯底資本主義國家的友好表示。這些就是日本在今天有可能和蘇聯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的根據。

又有人提出：日蘇互不侵犯協定的簽訂是不是與中蘇互不侵犯協定的簽訂有衝突的呢？這就是說，是不是與蘇聯的不侵犯日本有衝突的呢？我們可以這樣回答說；在原則上講來是沒有衝突的。爲什麼呢？因爲依一般互不侵犯條約內容的規定是這樣的：

「第一條 兩締約國重行鄭重聲明，兩方斥責以戰爭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並否認在兩國相互關係間以戰爭爭爲施行國家政策之工具，並依照此項諾言，兩方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多數國家對於彼此爲任何侵略。」

「第二條 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被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爲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侵略之締約國。」



(見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假定說：日蘇互不侵犯協定是簽訂了，由日蘇及中蘇這兩個協定所引起的問題之一，就是蘇聯幫助中國進行了民族戰爭，蘇聯對於日本是否違反協定第一條中所稱的：「單獨成聯合其他一國成多數國家對於彼此為任何侵略」呢？我們以為並沒有違反。因為中國不是侵略日本的國家，而是被日本侵略的國家，故蘇聯的幫助中國不能視為違反條約。那末，由這兩個協定所又引起的問題之二，就是蘇聯與日本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由中蘇協定來說，是否違反了第二條中所稱的：「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呢？這裏，我們以為不能從字面咬文嚼字作抽象的解釋，應該從蘇聯實際行動上所表現的具體事實來解釋，就是不能把蘇聯與日本解決了兩國間的懸案，訂立了商約，以致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認作為「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條約中譯），這第一因為事實上蘇聯超出了中蘇協定的範圍，而給與中國以最多的幫助，這種幫助是多於蘇聯幫助日本（就使我們承認對日本有點幫助的話）的幾十倍；這第二是否因為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蘇聯就該與侵略中國的一方採取同樣敵對的行為呢？從事實來說，這種敵對行為發展下去是否對中國有好處呢？從條約來說，蘇聯又是否有必須聯帶與侵略的一方採取敵對的義務呢？顯然蘇聯在條約上說來是沒有這種義務的。那末，又有什麼理由說，蘇聯不應與日本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即商業關係與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呢？所以從互不



侵犯條約中的第二條來說，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對中國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日蘇關係改善的結果，至多能做到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為止，這是我們預計日蘇關係往好的方面發展的最高峯。蘇聯絕不能做到因改善日蘇關係而幫助日本的侵略，而幫助日本進行帝國主義間的戰爭。

第三個問題就是日蘇關係的改善，與中國抗戰的問題。

日蘇關係改善會對中國抗戰的前途不利嗎？會影響到蘇聯對中國的幫助嗎？會妨害到中蘇親密友誼嗎？這一連的重要問題，在這日本高唱改善日蘇關係的聲中，都浮在每一個關心着中國命運的同胞的腦際。

關於日蘇關係改善，是否會對中國抗戰前途發生不利的問題。我們的回答是，日蘇關係改善，對於中國的抗戰並無不利。這個「並無不利」的根據，不僅是從中國民族革命戰爭的利益出發，還要由蘇聯社會主義的利益出發，由世界革命的利益出發，換句話說，是應從這三方面統一的利益出發，站在這種統一的利益上來講，我們所希望於社會主義的蘇聯的，第一是能夠維持社會主義的和平，因此就必須與周遭的國家和平共處；第二是能夠與周遭的國家發生和平友善的關係（這是維持和平共處的必要條件）而避免互相敵視，以致有遭受攻擊危險的關係；第三是能夠不捲入帝國主義戰爭的漩渦，當帝國主義戰爭已經發生的時候，仍能維持和平中立的關係，為什



麼對蘇聯的希望是這樣的呢？這與我們的民族革命戰爭又有什麼聯系呢？與世界革命又有什麼聯系的呢？都是有的；因為只有和平，蘇聯方能勝利的建設社會主義，使社會主義的力量蒸蒸日上；只有和平，方不會把某一個國家與蘇聯的很小的局部的衝突，被帝國主義利用來擴大與宣傳作爲進攻蘇聯的前哨戰，因為帝國主義者無時無刻不在企圖將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轉變爲反蘇的矛盾，藉此來緩和帝國主義間的衝突，更因爲只有和平，蘇聯方能充分援助一切革命的力量（工人階級的革命與被壓迫民族的革命）。由於這個真理，對於日蘇關係的改善，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是與中國抗戰有利的，因爲蘇聯如能在東方免除反蘇的威脅（不管時間的久暫都是好的），蘇聯就更能多多的幫助中國。蘇聯與中國作戰的國家改善關係，似乎是對立的，但實際却是統一的。反過來說，如在東方或西方發了反蘇戰爭，這對中國的抗戰前途都是不利的，因爲消耗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必然會影響到對中國各方面的幫助。

關於日蘇關係改善，是否會影響到蘇聯幫助中國與中蘇友誼的問題，我們的回答說，自然也是不會的。爲什麼呢？因爲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是不以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以內的勝利爲最後勝利，而是以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以內的勝利，才算爲澈底的勝利。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更清楚的懂得：社會主義時代的民族革命，是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援助被壓迫民族的革命，也就是爲的要把這走向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的勝利先完成一部



分，蘇聯是根據了這個基礎而確立牠對被侵略民族的外交政策的原則，這個原則是：「我不堅持援助一切因爭取祖國獨立而成了侵略行爲的犧牲品的民族」（斯達林：一九三九年聯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這還不明白嗎？只要中國自己的內部不安協，不動搖堅持抗戰，蘇聯也自然是會「堅持援助」的。蘇聯的這種「堅持援助」不是那種「因為中國是為蘇聯而戰」的無恥的荒謬說法，蘇聯的這種「堅持援助」是因為「蘇聯之基本原則在於幫助爭取自由及獨立民族之人民，使其獲得成功。蘇聯本身亦為爭取自由之國家，故對他人為自由而奮鬥者，莫不寄以極大之同情。蘇聯所以援助中國者，正以中國之抗戰，與蘇聯此種主張所吻合，而絕非因有何種物質利益可得而出此者也。此種要求，必須明瞭，否則勢必易於誤解蘇聯之政治」。（見塔斯社駐倫敦通訊員羅斯汀在英援華運動委員會上之演講）。由於這個真理，我們又否定了一個問題：即由日偽宣傳日蘇關係改善，可使蘇聯不助中國，中日戰事即可結束的問題，這完全是日本方面一個可憐的天真幻想。

另外却也由於日蘇關係改善的空氣，引起了一部分人對蘇聯不應有的懷疑和誤解。這一個懷疑和誤解，是認為蘇聯既與中國友好，不應和日本改善關係；第二個懷疑和誤解，是認為蘇聯如和日本改善了關係，就是幫助着日本對華的侵略；第三個懷疑和誤解，是認為日蘇關係的改善，就是蘇聯受了日本的利用；第四個懷疑和誤解，是希望蘇聯應乘日本暫時無力反蘇之際，反而要



和日本打起來。這一切的觀察都是不正確的，和有害的，我們在前面已經很清楚的分析過，這裏不必重釋。

最後，第四個問題，就是讓我們預測一下日蘇關係改善的前途。

日蘇關係改善的前途是要由下面的幾種關係來決定的，這就是說，要決定了：

第一、歐洲戰事的發展怎樣（這是主要的）？

第二、太平洋上日美關係的發展怎樣？

第三、美蘇關係的發展得怎樣？

第四、中蘇的關係怎樣？

第五、中國抗戰的發展怎樣（這也是主要的）中國如有部分的反攻力量，是可以牽制住日本的南進計劃的）。

第六、英、美、蘇對中國抗戰的援助？

第七、中國抗戰內部的進步怎樣？

這些關係都是就着相互的影響和相互的聯系的，不過有一點要認清楚：無論日蘇間的關係會發展得怎樣，蘇聯以社會主義為立場的外交政策是不變的。

## 八 由日蘇關係到中蘇關係

現在中國有些十足的糊塗蟲真是合着「平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看到日蘇關係有某種程度改善的傾向，便急的跳起來，不乘這機會先將自己對蘇聯的關係檢討一下，反而抱怨着蘇聯，立即用做告式的話對蘇聯說：不要「因日本的幾句媚語而立即轉變，由同情於中國抗戰者而同情於日本的侵華，無助於日本的侵華，使其自己將來感到噬臍的莫及」呀！（見九月十五日上海中美日報一週時事瞭望）朋友！這些話是多餘的，難道蘇聯看的不還比我們更清楚嗎？難道蘇聯對日本玩的什麼把戲不會比我們更明白嗎？我們還是設法改進自己對蘇聯的關係吧，這就是說，不要怕別人和蘇聯的關係改善得怎樣，却是要看看我們對蘇聯的關係增進的程度是怎樣。這就是說，我們要用更親密的中蘇關係來否定可能改善日蘇關係，但這個「否定」的關鍵在中國而不是在蘇聯，是在我們對蘇聯的態度不是口頭上的空談親善，做一些表面的文章，暗地裏却又還些不光明的反蘇勾當。

我們要「否定」日蘇未來的關係，我們必須還要很坦白勇敢的努力除去一些中蘇更親密合作的障礙，就是說要在中國內部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清洗一切暗藏着反蘇的頑固份子，正因為這些份子的存在，中蘇兩國還未能達到理想的合作無間。

我們要「否定」日蘇未來的關係，我們要爭取到蘇聯中國更大的「堅持援助」，我們要粉碎



日本及一切民族叛徒破壞當離開中蘇關係的陰謀，我們對外不僅要堅持抗戰，我們同時還要對內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因為這完全是有聯系的，不團結進步，就不能堅持抗戰；不能堅持抗戰，也就不能增進中蘇的關係，從蘇聯得到更多的援助。

我們要增進中蘇關係去否定日蘇關係，我們還必須要認清楚把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和日本與蘇聯的關係區分開來，就是我們與蘇聯是真正合作的，不是互相利用的，我們與蘇聯是為着人類一個偉大的共同目標而奮鬥，這種奮鬥既不是「中國為蘇聯而戰」，也不是「蘇聯利用中國去打擊日本」；而相反，日本與蘇聯的關係改善，是暫時的利用的，不是真正合作的。

我們要增進中蘇關係，重要澈底的了解這個必然真理；就是中國的民族革命戰爭，如沒有得到蘇聯更多的幫助，是不能夠獲取最後的勝利的，就不能夠使中華民族得到澈底的解放。

最後，我們中國對蘇聯的態度，我們隨時要溫習着法國失敗的教訓，這就是最近一次（八月二日）莫洛托夫在蘇聯邦院及民族院聯席會議上的報告中所說的：「法國之敗，非僅由於軍事準備之不充足，重要原因，厥為法國統治階級過份輕視蘇聯在歐洲事件之力量（同樣在亞洲事件之力量——作者），過去數日之事實，已證明法國潰敗更重要之原因，法當局未能當民衆聯系一起，彼等非特未以民衆為主要力量，且將酷愛自由之法國民衆置於不重要地位，此點實為法國衰弱最嚴重之因素。」（完）

## 求知叢刊

第五輯 論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鐵聲等著

葉青簡論

它把葉青一切背叛國家民族利益的荒謬言論，作了一個從根倒的工作，並揭發了掛羊頭賣狗肉者的無恥。

美國在大西洋的攻勢與太平洋的守勢政策

本文說明了美國在風雲緊急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真正態度特別對於英德戰事及越南問題有個深刻的觀察。

論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每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他必然真正是國際主義者也必然真正是個國際主義者，本文很清晰地把這現實的課題，提示於真正熱愛祖國的人們。

趙然先生列傳

長篇連載第五回，為美哉抗戰，典型人物的創造它是生動而活潑地映現在我們的面前。

九月二十五日出版 每冊實售四角五分

代售處 各大書店各報攤  
總經售 五洲書報社  
出版者 求知出版社

本社啓事 本社為徵求基本讀者，減輕讀者負擔起見  
特定有預約辦法，任何一輯定起均可。

每六輯 \$1.80 十二輯 \$3.40

特約代定處

兄弟圖書雜誌公司	四馬路三七八號
亞美書社	青島路六七號
青年圖書文具商店	戈登路二二號
藝文書店	靜安寺路新市場



# 蘇聯外交政策的史的檢討

希伯

蘇聯在我們這個世界中取得它的地位，已經快有四分之一的世紀了。正如莫洛托夫有一次打趣地說，她是「未被邀請」而到這個世界來的，她在那裏，被許多人所恨，也被許多人所愛。然而，不管恨也好，愛也好，這個無比的國家終究是一件不容抹煞的事實，是已經存在了二十三年的事實。

對於我們兵戈連結的世界，了解蘇聯的外交政策是特別重要而迫切的。這個巨大的國家佔有着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橫貫歐亞兩洲的大部份，幾乎遠及美洲大陸和歐非分野的地中海，並且與德英美日和中國的領土或屬地相鄰接，——它實代表着另一個世界。而且，不僅就領土說來，這國家自成一個世界，就它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說來也是的。不僅，由於仇恨和偏見，這個國家的制度，蒙蔽了許多國際關係研究者，使他們不能了解它的外交政策；還有因為蘇聯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跟世界別部份的根本不同，也是妨礙了解的。正如在任何科學中一樣，誰要了解事物的運動、表現和它所引起的感應，誰就必須首先了解事物的本質；也正如誰要是沒有首先了解蘇

聯制度和世界別國的不同，誰就不能了解蘇聯的外交政策。蕭伯納有一次講到蘇聯的外交政策，曾指出說：「共產黨領袖了解共產主義，正同他們了解資本主義一樣的澈底，」而「資本主義的煽動家們則既不了解資本主義，也不了解共產主義。」這裏，那「過失與其說是資本主義煽動家」的不能瞭解，還不如說他們相信單是煽動已儘足為他們的利益服務，而再費力去瞭解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尤其是蘇聯與其他世界的相互關係，是完全多餘了。但這是非常之短視的。舉例說這可以拿張伯倫對於蘇聯政策的失敗來證明，蕭伯納說上面的話時也許就在想着這一點吧。

×

×

×

如果我們從歷史上，即從這個國家在歷史進程上的表現來檢討蘇聯的對外政策，我們就可知道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確切說來，為促進和平與反對戰爭而鬥爭的問題）實主宰着蘇聯在對外關係範圍中的一切活動。當蘇維埃政權剛纔誕生的時候，它就開始了清算戰爭（係那革命所推翻的前政權傳給新國家的），和建立和平的工作。和平是布爾雪維克黨取得政權的一個最重要的諾言，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獲得廣大的擁護，正因為它是推翻帝國主義和遏止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個革命的綱領。和平的鬥爭同時也是革命勝利最堅實的基礎之一。在迫近的革命的準備中間，伊里奇寫道：「現在，可以確切的說，給予人民以和平，就等於是勝利」，他預言「勝利的無產階級將給俄國以和平，而經過三月來殘殺人民的恐怖以後，世界上決沒有一人國家，可能推翻一個和平



的政府，一個誠懇忠實而公正和平的政府。」

要拯救俄國出於帝國主義的戰爭是極端困難的，這只有用新的革命制度的力量纔能達到。和平鬥爭需要運用革命的策略，而這策略，只有在獨立的外交政策基礎上纔能發展，這跟舊式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根本不同，猶如革命所樹立的制度一樣。沙俄以英法聯盟者的資格參加戰爭。外國資本控制着俄國資本的重要部門，如燃料和冶金業，英法兩帝國主義和德帝國主義在控制俄國市場的鬥爭中都是死對頭。沙俄政府對外國財政資本負着重重的債，而經常向人民榨取千百萬的巨款以償付盤剝的重利，這些公債都是在巴黎倫敦柏林和不魯舍爾募集的。單是法國，在俄國政府公債中投資達一百萬萬法郎。爲了交換這個，一千二百萬的俄國兵士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替他們英法的聯盟者流血。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以後，俄國資產階級還堅持繼續戰爭，因爲它不僅在內部，同時還在外部，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等等的政策上被英法帝國主義的利益縛住了手足。因此，十月革命除了否認沙皇政府所舉的外債以外，一當其勝利的開端，又發動了和平的奮鬥。

在新蘇維埃權力前面的複雜問題，是把俄國從英法帝國主義，從帝國主義戰爭中解放出來。而不致墜入德帝國主義的掌握。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九日至十日發表的革命的任務一文中，伊里奇寫道：



「蘇維埃政府必須立刻對交戰國人民（即同時對他們的政府和工農大眾）要求締結一個根據民主條件的一般和約，並締造一個當即停戰的協定。……如果事出於意外，即如果沒有一個國家接受停戰協定，那末戰爭就真的迫臨我們了，這就真的成爲一個正義和自衛的戰爭了……至於英國，美國和日本，即使他們對俄宣戰……他們決不能使俄國受到對德奧土戰爭的損失和破壞的百分之二的。」

依照這個行動路線，新蘇維埃政權的最初行動之一，便是發表和平宣言，籲請交戰國家締結當即停戰的協定，並允許談判不割地不賠款的公正的和平。英法政府拒絕接受這個建議，蘇維埃政府乃決定單獨與德國，奧國和土耳其談判和平。在談判的過程中，德國顯然想強定一個割地的帝國主義的和約，攫取以前帝俄領土的一部份，使波蘭，烏克蘭，芬蘭和其餘波羅的海諸國成爲德帝國主義的附庸。伊里奇的目的，上面已經說過，原是要締結一個不割地不賠款的公正而民主的和約。德國儘管提出了這樣非常苛刻的條件，但他却堅持主張與德國議和，以爲只有這樣，纔能獲得一個喘息的時間，俾鞏固蘇維埃的權力，取得農民的支持，建立紅軍，摧毀國內的反革命，組織蘇維埃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並盡力準備保衛社會主義共和國。

在爲達到對德議和的鬥爭中（伊里奇與斯大林反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拉狄克的劇烈鬥爭）伊里奇曾以蘇維埃政府和平鬥爭的原則和策略，教訓了蘇俄的共產黨和所有的蘇維埃人民。當國家因了帝國主義的戰爭而糜爛，勞工大眾瀕於飢餓，軍隊精疲力盡而陷於崩潰的狀態，那時候，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造成一個喘息的時間，俾鞏固蘇維埃的權力，樹立新的革命基礎和革命機關，以保衛這個解放了的國家。在推翻俄羅斯帝國主義的任務完成以後，必須把這個國家從帝國主義戰爭中拯救出來。這時候，除了單獨對德媾和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取得這迫切需要的喘息時間，條件儘管非常之苛刻，但終得暫時接受，直到，正如伊里奇當時所說，「歷史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只有當德國不顧蘇維埃政府的準備議和，懷着干涉和侵略的野心而繼續侵入俄國時，只有那時候，正如伊里奇所指出，蘇維埃政府將盡力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以反抗德國，並接受「英法帝國主義匪徒」的軍事援助。

在一九一八年黨大會提出的論和平一文中，伊里奇指出道：

「單獨的議和，我們將盡可能的在現在這時候，從兩個帝國主義交戰國集團中解放了我們自己，我們利用他們的仇視和戰爭，因為這阻止了他們聯合反對我們的行動，使我們有一個時期，可以放手推進和鞏固社會主義革命。」

大會關於媾和的決議曾經指出，隨着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開始，「帝國主義國家（西方和東方兩者）不斷的軍事進攻是歷史地不可避免的。」經常準備反抗這種「新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成爲共產黨的最重要而最基本的任務。牠必須對俄國的工農說明，「俄國將在歷史上不可避免面臨到民族的和社會主義的解放戰爭，」牠必須爲此樹立羣衆組織，以從事聯合的自衛行



動，並對成年的人，不論性別，在軍事科學和技術方面，施行切實的有系統和普遍的訓練。

總括起來，在俄國退出帝國主義戰爭和建立和平的重要問題上，伊里奇領導下的蘇維埃政府當時的政策究竟是什麼呢？在十月革命的前夕，伊里奇曾宣稱，「社會主義的統治」就將是「和平的統治」。暴吼於兩大交戰國集團間的世界戰爭，伊里奇斥責雙方都是帝國主義的，併吞主義的和掠奪的戰爭。因此，他認為蘇維埃政權的任務，是把它自己從兩大交戰國集團解放出來。在這一點上，伊里奇認為最迫切的是先與俄國在歐洲的鄰國，即德國，奧地利和土耳其締結和約。伊里奇明白的看到，單獨對德媾和，可能成為英美和日本向俄宣戰的理由。但即使如此，伊里奇仍堅決主張俄國退出對德的帝國主義戰爭，她是被沙皇帝國主義政府和它的英法聯盟者牽入的。伊里奇首先想到這次帝國主義戰爭所加於人民的損害，同時又想到俄國不能退出兩大交戰集團對於蘇維埃政權的威脅，因此他確定這次鬥爭的戰術如下：首先我們應把我們自己從對德奧土的戰爭中解放出來，然後可以保衛我們的自由和獨立，而不致受英美和日本的屠殺。只有當德國拒絕了和平，那繼續對德戰爭纔無可避免。那時候，伊里奇說：戰爭將「真的迫臨着我們，真的成爲正義的和自衛的戰爭」，而蘇維埃也儘可接受德國的帝國主義勳敵，英法帝國主義的援助了。最後，伊里奇也十分知道蘇俄所可望任何帝國主義援助的是什麼，就是即使他們援助它，他們却決不能容忍俄國存在「社會主義的統治」或「和平的統治」，因此即保衛蘇維埃國家以反抗東西兩



面夾攻的「新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就成了新國家生死關頭的事情。最後，伊里奇主張把和平與反抗侵略威脅的對外政策，跟高度準備應付不可避免的「民族和社會主義解放戰爭」的對內政策相聯合起來。這就是伊里奇領導年青的蘇維埃國家時的政策，這就是他在一九二四年去世時留給共產黨和蘇聯解放的人民的遺產。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對於目前帝國主義戰爭的政策，正是恪守着伊里奇在他們當時鬥爭中所規定的原則與戰略的。

×

×

×

蘇聯的對外政策，既是爲了保障蘇維埃國家的和平，以從事社會主義生產制度的建設，它對於邊疆的形勢，自然要加以最大注意的。在這一點上，蘇聯在歐洲邊境的安全極爲重要，尤其是波羅的海形勢和對德的關係。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勝利固然使俄國退出了帝國主義戰爭，但對德帝國主義却不是沒有付出重大的代價，使她得暫時在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區域樹立了附庸國。要不是爲了國家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精疲力盡，要不是爲了帝國主義交戰國聯合絞殺初生的革命政權的威脅，蘇俄決不會對德帝國主義作這樣的讓步，而必將堅持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一九一八年勃列斯脫立要妥夫斯克和約的締結，是蘇維埃政府一個巧妙的反擊，這樣一來，她可以獲得喘息的時間，而帝國主義列強却在相持作拚命的搏鬥。一九二一年，在烏克蘭再被解放和波羅的海諸國從德國佔領中脫出以後，伊里奇說道：「現在，就是頭號的笨伯也可以看出勃列斯脫立要妥夫斯克



的讓步是如何的增強了我們，並擊破了國際帝國主義的力量。」

就是在一九一八年德國被協約國打敗以後，蘇聯仍繼續對他維持着和平，而且不想報復勃立斯脫立安夫斯克的恥辱。不過，他開始清算德帝國主義對俄國以前邊境的繼承權。這就是說，她利用這機會，與德國建立一個真正的，公平的，永久的和平，一個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這她曾在一九一七年宣佈為她的目標，而被德帝國主義殘酷的力量所阻礙了的。這裏最重要的事實是她揀定這個機會來清算勃立斯脫立安夫斯克和約，但可並不因此把蘇聯捲入了新的大戰，相反的，她仍和德國確保着和平的關係，並因修正蘇聯的邊境安全而更形加強。

一九一八年對壓倒的德帝國主義力量作了無可避免的讓步，目的在獲得一個喘息的時間以加強蘇聯防衛的力量和擊破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那時候，伊里奇確信「歷史將提出自己的」以修正這顯著的不公平的要求。他利用着這喘息的空隙，鞏固了蘇維埃的力量擊退了外國的干涉，完成了蘇聯所有邊境的和平，並增強了新的革命力量以抗外國進攻的安全。當伊里奇說到，「歷史將提出自己的要求」時，他並非在想着蘇聯的力量足以作戰，而是在想着她的力量足以維持其鞏固和平，足以保障蘇維埃國家打退外國的進攻，足以在社會主義國家邊境以外阻住帝國主義。說這話的不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政治家，而是一個革命國家的領袖，他曾把國家從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中解放出來，而主張在國際間維持和平與友好的政策。



且讀一讀聯共(布)黨史中關於德國的失敗，而降落於二等強國的地位以至伊里奇的黨對於此事態度的記載，就可知道它絕無報復勃立斯脫立安夫斯克恥辱的念頭，而只是一意為和平與蘇聯國家的完整而奮鬥。其中有一段道：

從蘇維埃政權的地位看來，這個情況有某種不利，因為它使那些組織武裝干涉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協約國變為歐亞兩洲的統治力量，給他們以可能來加強武裝干涉並組織對蘇維埃國家的封鎖，更加緊了圍困蘇維埃政權，而實際結果正是如此。……在另一方面，它還有更重要的，在根本上有利於蘇維埃國家地位的良好作用。第一，蘇維埃政權得到了可能來取消掠奪性質的勃立斯脫立安夫斯克和約，停止支付賠款並進行公開的軍事的政治的鬥爭，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白俄羅斯、立陶宛、烏克蘭、外高加索從德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第二，而這是主要的，在歐洲中部，在德國，共和制度和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之存在，一定會，而且曾經使歐洲各國革命化，而這個情況就不能不鞏固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地位。

勝利的協約國在一九一九年所加於德國的凡爾賽和約，伊里奇認為比勃立斯脫立安夫斯克和約「更苛刻和卑鄙得多。」他指出協約國對德的所謂「解放戰爭」「民主戰爭」的宣傳完全和事實相反，他們壓迫德國接受了「盤剝重利者的和平，劊子手的和平，和殘殺者的和平」。那些新的和約，一面割裂了奧地利和德國，而在東歐建立了新國家，同時也是針對着蘇聯。波蘭，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拉夫是增大了，它們併入了巨大的少數民族，如從俄國併入了烏克蘭一部份，白俄



羅斯和比薩拉比亞，從匈牙利併入了斯洛伐基亞和外錫爾凡尼亞，從保加利亞併入了杜白魯查。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拉夫成爲英法的「勢力範圍」，成爲介於蘇聯與德國之間的勢力範圍。

有一次在一九三〇年黨大會中說到此種情形時，斯大林宣稱英法曾從蘇聯手中割取了比塞拉比亞，交給羅馬尼亞貴族去奴役。斯大林繼續說，協約國藉口布爾雪維克宣傳的威脅，曾樹立「哨兵線」障礙物和「鐵絲網」，以使中歐與東歐隔絕起來，「而把看守『鐵絲網』的光榮職務很慈愛的交給波蘭，羅馬尼亞，芬蘭等國。」

在這些國家中，特別是波蘭，被協約國挑定充當反蘇的尖兵，這個職務於她似乎格外適宜，因爲波蘭帝國主義者早有吞併烏克蘭和擴展領土到黑海的野心。在一九一九年，波蘭已超過了凡爾賽所允許給它的領土而擴展到烏克蘭，一九二〇年，她又在協約國公開的教唆之下，發動反蘇的戰爭。但在一九一八——三二年時期中一切干涉和侵略的戰爭，無論是協約國自己，或白俄傀儡，或波蘭，都歸失敗了，這是由於蘇聯日益成長力量的全力抵抗，也是由於英國工人以及外國侵略軍隊中的士兵對於干涉的日益不滿。伊里奇說得好：「國際資產階級只要一動手來打我們，它的手就被自己的工人捉住了。」

至於波羅的海諸小國，如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它們從俄國以前領土中分離



而成了蘇聯的鄰邦，對於它們，蘇聯的政策是防止其不再成爲德帝國主義的附庸和威脅列寧格勒的根據地，因爲它們原是在德帝國主義的軍事援助之下，從俄國脫離的。不過，即使在德國失敗以後，蘇聯也並不想征服這些國家。恰恰相反，蘇聯還承認了它們的獨立，並竭力跟這些國家維持和平，友好和善鄰的關係。自然，蘇聯決不能容認這些國家被德帝國主義或協約國帝國主義用作進攻蘇聯的根據地。

就是蘇聯對於波蘭和羅馬尼亞的態度也沒有什麼不同，雖然羅馬尼亞攫去了比塞拉比亞，波蘭攫去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一部份。蘇聯從未承認羅馬尼亞的併吞比塞拉比亞，但它的政策却不是因此就與羅馬尼亞戰爭。至於波蘭，她雖然以前征服過烏克蘭一部份和白俄羅斯，但只要她能放棄仇視蘇聯的態度，只要她能放棄充當德國和英法帝國主義反蘇的先鋒以換得蘇聯領土報酬的帝國主義夢想，蘇聯是準備在和平，經常貿易和善鄰的基礎上，與該國穩定相互的關係的。

蘇聯想勸服波羅的海諸國以及波蘭和羅馬尼亞：只有與蘇聯維持和平與友誼的關係，纔於他們有利。她同時又警告他們，她決不能容忍這些到蘇聯的戰略要津，變成帝國主義列強進攻蘇聯的根據地。最後，他向她們表示不僅尊重她們的獨立和完整，同時還願與她們合作保護她們的和平與安全，以反抗外國帝國主義的包圍，不過她們也必須同蘇聯一樣，出以爲和平與善鄰關係鬥爭的精神。



講到蘇聯與她西方鄰國的關係，伊里奇在一九一九年曾說：

「這些小國每一個都已有過協約國的貪得無厭的經驗。他們知道當法美英的資本家說『我們保證你的獨立』時，這句話的實際意思是：『我們已買得了你所有的資源了，你已處在我們的袋裏。而且，我們替你應付危急的方法，就是讓一個官走跑到外國去統治和觀察，他不受任何考慮的拘束。』他們知道英國派到這樣一個國家去的任何使節，要比任何本國的統治者或國會還更有威權。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以前不懂得這點，但現實終於迫得他們懂了。至於那被帝國主義所掠奪的這些小國中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份子的態度，我們（即蘇聯）雖算不得是同盟者，但却是比帝國主義可靠而有價值的和平的鄰人。」

這就是伊里奇在外交政策方面交給布爾雪維克黨的遺產。它教他們清算勃立斯脫立安夫斯克和約，怎樣把帝國主義獨斷的掠奪的和平，變成一種不割地不賠款的公正的和平。它教他們怎樣努力與那為便利進攻蘇聯而建立的小國維持善鄰的關係，又教他們怎樣把這些國家轉變為與蘇聯合作保衛和平的和平鄰邦。

這裏，還必須指出伊里奇對於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等鄰國的外交政策的歷史意義，政策便是平等對待這些國家，扶助它們爭取民族的獨立，並和它們在政治經濟上合作以反抗帝國主義的干涉和侵略。這種新政策根本清算了沙皇與西方帝國主義合作瓜分這些國家的政策，征服並掠奪這



些國家全部領土的政策。伊里奇特別指出東方民族解放運動興起的重要性，認為這是「新的人民和新的階級對於新生和戰鬥的覺醒，是『幾萬萬人類的覺醒』它們構成了世界人口的大部份，直到現在，由於它們歷史的怠惰與歷史的衰靡，造成了歐洲許多先進國家的停滯。」在一九二四年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的講演中斯大林曾指出像印度和中國這樣殖民地和附庸的國家，沿着解放大道的民族運動的每一步，實都是「對帝國主義的嚴重打擊。他當時又預言帝國主義的危機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預示着殖民地國家中的民族戰爭，和帝國主義方面的干涉」照伊里奇所規畫，蘇聯對於這些鄰國人民的外交政策，從蘇聯存在的開始就是一種和平，友好並幫助它們民族解放鬥爭的政策。

上面所述，就是伊里奇所建立的蘇聯外交政策的原則和戰術，這在蘇聯全部歷史中是一貫地遵行着的。是的。在斯大林的領導之下，照蘇聯日益成長的經濟和政治的力量，以及蘇聯在國際事情中相應擴大的影響，那些原則和戰術是愈益前進和發展了。伊里奇的外交原則和戰術的應用，主要是爲了對付國際形勢的發展，總之是爲了蘇聯權力的成長和它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侵略的鬥爭中影響的擴大。因此，在一般和平，以及區域的和集體的安全鬥爭中，蘇聯的和平與安全，成爲一個較強的因素。她維持邊境的和平，她努力建立善鄰的關係，她打出東西兩面邊境挑戰的屠殺和侵略，所以蘇聯實是世界和平最忠實的保衛者和侵略的敵人。蘇聯的外交政策每次表



現着她對外的利益是和平與安全，她要從一貫採取和平政策中保衛她自己，她有充份的力量可以保衛她的領土，如果必要，她可以爲此運用武力。這種政策不僅符合了蘇聯人民的利益，同時也符合了全世界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他們是侵略的和帝國主義的戰爭的犧牲者。

蘇聯的和平鬥爭表現了兩個不同然而密切相關的方面。一方面是蘇聯本身爲一社會主義和工人的國家，這正跟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極端相反，因此自然希望與所有國家維持和平。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作爲資本——帝國主義世界包圍中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是處於戰爭，侵略和外國干涉的經常威脅之下。事實上，蘇聯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正如斯大林所指出，她「被資本主義世界所包圍，受着外國軍事進攻的威脅，因此不能獨自撇開國際的形勢」，而必須有強大的軍隊，和必須正常的警戒，「強大到足以保衛社會主義而不致受外國的進攻。」因此，蘇聯的對外政策，不僅在保障她邊境的和平，同時也推進着世界的和平與反侵略鬥爭。

蘇聯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在那裏，經濟恐慌是不知道的，工業在繼續的向上發展，經濟發展的邁進和政治文化的力量有着國家內部力量成長的保證。因此阻止外來的侵略的和平安全便成了她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這種社會經濟制度用不到戰爭而只需要和平。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週期的經濟恐慌對於個別國家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影響是不能避免的。資本——帝國主義世界如果沒有殖民地的剝削，如果不割併外國的領土，如果不發動重分世界和殖民地市場的戰爭，以



克服它們的危機，如果不把這危機的損失轉嫁到貧窮的勞工階級，窮小民族和敵對的帝國主義身上去，那它就決不能存在的。蘇聯和資本——帝國主義世界間的巨大差別，即經濟恐慌的制度與沒有經濟恐慌的制度間的差別，戰爭的制度與和平的制度間的差別——這種矛盾，不外是那兩個制度間鬥爭的特有表現。現任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於一九三九年在莫斯科的一次演說中，曾稱和平制度與戰爭制度間的這種對立，為「大規模的力量試驗。」他指出這是一種和平的競爭，「我們走我們的路，而資本主義則走它的路。」但正因為蘇聯以日益有力而積極的姿態干涉資本——帝國主義世界侵入蘇聯的「權利」，所以蘇聯也就在反對和阻止帝國主義列強「把全世界捲入重分他們贖物的戰爭中的「權利」。

資本——帝國主義世界的不能避免經濟恐慌，不能避免分割和重分殖民地市場以及獨佔金融資本活動範圍的戰爭，已日益成為資本主義本身存在危機的源泉了。這在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存在的時期，尤其是如此，因為它證明了在資本主義清算之後，經濟恐慌已在那從資本主義解放出來的世界中消滅，同時也消滅了壓迫，世界霸權和戰爭的帝國主義的災禍。因此，我們可以證實帝國主義列強自然的願望和主張，是在排斥社會主義國家，因為由於它經濟力量的成長與和平的奮鬥，人類就可好好地組織它的經濟和社會生活，而不復有經濟恐慌和戰爭了。因此帝國主義世界願望並主張設法把侵略戰爭轉移到蘇聯方面去。



史太林在一九三〇年講到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和帝國主義列強中間行將到臨的爭奪市場的新的世界戰爭時，曾經說道：

「因此，資本主義的矛盾每次開始更尖銳化時，資產階級就把目光轉向着蘇聯，似乎在說：『我們不能解決，解決這個或那個資本主義的矛盾，我們能以蘇聯為犧牲來解決所有資本世界的矛盾，蘇聯那蘇維埃的國家，革命的堡壘，它的存在，將使得勞工階級和殖民地革命化，阻止我們安排新的戰爭，阻止我們重分世界，阻止我們成為它廣大的國內市場（指蘇聯）的主人，而這，由於經濟恐慌的緣故，特別是今天，對於資本家是非常之需要的。』」

帝國主義列強既切想以蘇聯為犧牲來解決他們間的矛盾，於是便發生了把蘇聯拉入帝國主義戰爭的欺騙說法，即把蘇聯列入帝國主義某一交戰的集團中。我們認這種說法是欺騙的，不僅因為蘇聯外交政策的所有原則，就是蘇聯作為蘇維埃國家的存在，也就是推翻這種說法的一個因素。這種性質的誣蔑，只是暴露了加害者對於蘇聯和平政策性質的全然無知，因為伊里奇當一九一八年對德締結和約時論及這種策略，就解釋是「把我們自己從帝國主義交戰國的雙方集團解放出來」的一種手段。恰恰相反，帝國主義列強間衝突無可避免的事實，正被蘇聯在為和平奮鬥的政策中運用着，即「利用他們的敵視和戰爭，阻止了他們對我們的聯合行動」，這也是伊里奇在一九一八年所曾指出的。



斯太林在一九二四年演說列寧主義問題時，曾着重指出蘇聯革命鬥爭的間接後備軍是「與無產階級國家敵對的那些資產階級國家間的矛盾，衝突和戰爭（例如帝國主義戰爭）」。斯太林又指示將來的教訓道：「現在，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是日益表面化了，他們中間的新戰爭是不能避免了」，在蘇維埃的和平鬥爭中號召這種後備軍已愈形重要。十五年以後，一九三九年三月，當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已到達了第一階段，斯太林又確定蘇聯共產黨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任務道：

（一）繼續和平政策並增強對所有國家的事務的聯繫；

（二）當心我們國家被那些戰爭販子牽入紛爭，他們是慣叫別人替他們抓取火中栗子的；

（三）加強紅軍和紅海軍至最大限度；

（四）與所有國家中勞工人民增強友誼的國際聯繫，他們是贊成國家間的和平與友好的。

基於這樣的信念和打算，蘇聯外交政策拿「和平不可分割」警告所有的人民，以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者和戰爭販子。最初建議締結互不侵犯公約的也是蘇聯，她跟大部份的鄰國都訂了這種公約，只有侵略的國家拒絕它的建議。在好多地方，蘇聯又把這種互不侵犯公約的擴大為反侵略的互助協定。蘇聯又創闢了以推進區域安全來促成世界集體安全的路，即通過中立公約，在不侵犯公約和互助公約的制度來限制戰爭的範圍，並擴大以社會主義國家為中心的和平的統治。最後，在同一的基礎之上，蘇聯又宣稱「援助為民族獨立鬥爭的被侵略者」是她的外交政策的一個



原則，事實上這曾表現於她的援助西班牙共和國和堅決援助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政策。

自從侵略的新浪潮開始以來（在目前的帝國主義戰爭中達到了最高峯），蘇聯的外交政策愈益顯示了它的堅定性。蘇聯曾按照她和平鬥爭的路線，提供過她的援助用集體的力量，來制止侵略，避免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可是對立的帝國主義集團方面對於這種援助的表示，却發生了許多誤解，他們爲了各自的利益，竟想利用蘇聯政策來達到他們在帝國主義鬥爭中的目的。

法西斯列強的侵略集團，在反共公約中藉口它們的目的是反蘇聯，部份的却是準備進攻英法美勢力範圍的烟幕，它們又咒罵蘇聯幫助它們敵人維持世界的統治。這是完全虛妄的。蘇聯從來不會是維持英法美世界統治的一員（後者還是於蘇聯存在後十一年，即一九三三年，承認蘇聯的）。蘇聯從未參加戰後的任何條約，這些條約是協約國列強在一九一四——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勝利以後，爲了樹立與維持他們的世界霸權而締結的。當它們勝利的最高峯時，英法是對蘇的干涉戰爭，封鎖不承認政策最積極的推動者。在波羅的海諸小國，在芬蘭和羅馬尼亞，英法支配者一向是把這些國家組成反蘇集團的陰謀與壓力的源泉，是對蘇挑戰行動的煽惑和準備的源泉。

在另一方面，蘇聯並沒有忽視了這事實，即遠東和中歐新戰場的興起，首先會有着反蘇聯戰爭的極大危險。當蘇聯與日本建立善鄰關係時，她仍竭力加強它遠東的邊防。對於西面也是如此，她曾警告德國，要是順從帝國主義征服蘇聯的計畫而向蘇聯進攻時，她將不可避免地受蘇聯



報復的打擊。蘇聯一面不准法西斯的威脅，並應付她邊境的被攻擊，一面又以實際的區域安全的協定，從事和平的爭取，這在遠東和西方都是如此。最後，她又展開廣泛的國際行動，以推進集體安全，和集體援助被侵略者。這裏，蘇聯向全世界表示，她自己邊境的安全與和平固然是她最大的關切，把這種推進和平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努力推廣到全世界，也正是她最懇切的希望和符合國際的利益。

早在最近蘇德互不侵犯公約（跟他們一九二二年所締的拉伯羅公約性質相同）締結前五年，即一九三四年一月，斯大林就在聯共大會中說道：

「有些德國的政治家，關於這一點說道，蘇聯現在接望着法國和波蘭，說蘇聯已經由反對凡爾賽和約的國家成爲擁護這個條約的國家……問題不在於我們對凡爾賽條約的態度，有了爲人們所設想的那種改變。我們是受過勃立斯脫和約的恥辱的，我們那裏會贊美凡爾賽條約。我們所不同意，只是一點，就是不同意人們想爲了這一個條約而把世界捲入新的戰爭漩渦。關於人們所設想的所論蘇聯改變方針，也應該這樣說。我們從沒有傾向於德國，同樣的，我們現在也並不傾向於波蘭與法國。我們在過去和現在都傾向於蘇聯，而且僅僅傾向蘇聯。要是蘇聯底利益與某些不願破壞和平的國家接近，那末我們就毫不猶豫地去與這些國家接近。

不，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德國底政策有了改變。問題是在於：還在現在的德國政治家上台的前



夜，尤其是在他們上台以後——在德國，兩條政治路線之間的鬥爭，舊政策與新政策之間的鬥爭就開始了；舊政策曾表現在蘇聯與德國之間的著名的條約上，而「新」政策，在基本上是與過去德皇的政策相彷彿的，這位德皇，過去有時候佔領過烏克蘭和向列寧格勒進軍，把波羅的海沿岸各國諸成了這種進攻的根據地。而且「新」政策顯然是比舊政策佔上風。……同志們，問題就在這裏。」

不侵略的集團，即所謂「民主國家」，反對集體安全的政策，特別是拒絕蘇聯以平等資格參加共同反對三個侵略者的任何制度，它們只準備答應蘇聯關於集體安全提議的某幾點，希望這仍可把侵略轉到蘇聯頭上去。他們這種錯覺是由於他們忽視了「瑣細的一點」，即蘇聯的擁護集體安全，是一些也不違背不參加帝國主義衝突的原則的。恰恰相反，蘇聯的願予援助，只是以基於平等地位和相互義務的互助協定，來限制帝國主義衝突的範圍。對於這種援助的拒絕，除了表現把侵略轉向蘇聯並使他陷於孤立外，結果還使蘇聯的援助毫無效力，更談不上集體安全了。

在西方，蘇聯曾與法國和捷克締結了互助協定，可是法國和英國對這的答覆，却是一九三八與德締結了捷克的慕尼黑協定。蘇聯看到這可恥的行爲，正如斯大林說，「捷克地方送給德國，是作為發動反蘇戰爭的代價的。」在一九三九年莫斯科談判中，又曾有一次挑起德與蘇衝突的企圖。因此，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蘇聯最高會議中，報告莫斯科談判的失敗經過道：



「在一方面，英國和法國政府恐懼侵略，所以願意與蘇聯締結一個互助公約，以增強英法他們的力量。但在另一方面，英法又害怕如果與蘇聯締結了真正的互助公約，也許增強了我們蘇聯而這却不是他們的本意。可以說，他們這種恐懼的打算，是超過其他一切的。」

在同一次演說中，莫洛托夫又特別強調指出蘇德互不侵犯公約的目的，正如伊里奇在二一八年所指出，是要把蘇聯從帝國主義交戰國的雙方集團解放出來，他說明這次公約的效力，「蘇聯可以不被捲入戰爭，無論是站在英國方面打德，或是站在德國方面打英。」他又指出「這個公約（像失敗的英法蘇談判一樣）證明了國際一切的重要問題，以及東歐的次要問題，沒有蘇聯的積極參加就不能解決，而任何排斥蘇聯的企圖，結果結歸失敗。」

在東方，挑動蘇日衝突的企圖，也造成了跟歐洲情形同樣的縱容日本侵略中國政策。日本的攫取東三省沒有受到美國的干涉，而且還獲得英法的直接贊助，因為這些列強認為這種對他們遠東和太平洋利益的侵略行動，實是日蘇戰爭的序幕。當一九三三年美國與蘇聯復交時，斯大林曾對紐約時報記者杜蘭蒂（D. Duranty）說，蘇聯已完全準備與美國在國際上合作去謀和平。斯大林在這次談話時指出蘇美邦交的恢復，「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行動，政治上，它增進了維持和平的機會；經濟上，它消除了非必要的過慮，而使我們兩國可以在商業的基礎上討論問題了。最後，它打開了相互合作之路」。



但是，蘇聯方面儘管表現了這樣的願望，美國却無意於「相互合作」，甚至是合作制止日本的侵略。無疑地，美國是贊成制止日本在太平洋的侵略的，也贊成在某限程度上制止它在大陸方面的侵略。不過，只是某種限度，即在蘇聯的領土或鄰近蘇聯的區域之外。對蘇邦交的恢復，在美國想來，只是作為對日本的一種威脅，也可能是對蘇聯的一種「鼓勵」，叫它去與日本搏鬥，以解救美國的困難。

只要有合作的機會，蘇聯總常是贊助有組織的國際合作，來鞏固和平的。當一九一九年國際聯盟創立，以保衛英法在歐洲的霸權的時候（那時英法正積極干涉蘇聯）蘇聯就明白看到國聯是對她自己的一種威脅，是一種策劃反蘇的機關。後來，在英法建立歐洲反蘇集團的企圖失敗以後，侵略列強又都先後退出了國聯，蘇聯於是加入國聯，認為「國聯雖然脆弱，不能有制裁侵略的作用，但作為某種和平的工具，雖然軟弱，却也可阻止戰爭的爆發。」（斯大林語）

蘇聯採取了一種和平與不捲入帝國主義衝突的政策。她堅決地採取了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干涉的自衛政策。她遵守着社會主義的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存的原則，並與所有國家維持和平的與事務的關係。她的對外政策，是積極保衛她領土的安全，並建立區域的安全，以反抗侵略，因為這樣，可以限制戰爭的範圍和擴大和平的統治。她願意與全世界的人民和國家合作以共謀普遍的和平與集體的安全。這便是蘇聯的對外政策。



## 論青年的苦悶

徐 奮

我國的青年是許多許多年代苦悶下來的，舊戲裏老早就唱着：「思想起來，好不煩悶人也！」可知先前的青年做人已經很不快樂，不想則已，想起來就要煩悶。近來是不叫煩悶而叫苦悶了，其間實在沒有大不同，不過苦悶比之於煩悶，悶得更厲害吧了。

## 一

我們現在要問什麼叫做苦悶呢？

對於這，曾經有過不同的曲解。頗著名的奧國精神分析學者弗洛伊特說，像癡病，即譯名叫做歇私的里的，那樣的病，根本原因是原為其人在生活過程當中，曾經受了精神的創傷。再明白的解釋起來，他的意思是說，青年是具有強烈的性的欲望的，這欲望，他特別稱為利比陀 (Libido)，但是它如遭受了自己的道德觀念或其他的因素的壓抑，他自己雖然沒有明白的意識到，但精神上却已受了創傷，這創傷潛在意識的下層，擾動他，或攻擊他，使他呈現出歇私的里的病症。這種利比陀受壓便稱為「苦悶」。弗洛伊特說這種毛病可以醫好的，比方用巧妙的問答

法，使病者很自然地說出這種苦悶的原因，使他去掉這壓抑，將欲望搬到意識世界裏，壓抑除去，病就會好起來了。

這是一種說法，還有些人認人生有一種生命力，這種前進的生命力如受壓抑，便要發生苦悶和懊惱。人不耐這種苦悶，或者絕望自殺，或者發洩出來，成爲文藝創作等。但這些話並不可以相信，批評不是現在要做的工作，這裏不過隨便提起來，做一個引子。

## 二

發生煩悶的青年，在若干年前，許多人相信女青年特別多些。在那時候，雖然沒有受弗洛伊德的學說的影響，但也常常叫這種煩悶爲「性的煩悶」，他們以爲這種煩悶之來是從性鬱悶出發的，這種見解似乎有點接近弗洛伊特了。人類是兩性生物，社會上的人不是男的便是女的，人類當然有一定的性別。但少女的煩悶是否由於性，這却很可疑，我們須加以檢討才是。

對於這檢討，我們不可不首先注意過去時代的女人的地位。過去的女人，直白的說，是財物，不是平等的人（現在的地位還高不了好多）。三從四德的三從規定她在家從父，出家從夫，夫死從子。她終身是一個附屬於人的財物，獨立自主之權是終身沒有的。她的死活都操在別人手中，她的將來的生活如何，完全須「碰機運」。她自己無從爲力，也無法努力的。生活在這樣一



種地位的青年女人，的確，不思想起來則已，思想起來是要煩悶的。所以這種煩悶，如說於性有關，不如說由於政治，法律，道德的各種壓迫，及受了非人的待遇所致。從前有一句俗語：「丈夫有勢妻榮耀」，把女子的無地位和悲哀一句話說得淋漓盡致。而且這種情形，不能減少女人的苦悶，反而延緩女性的覺悟。

## 三

若說煩悶是青年女子特有的精神狀態，男子並不分担一部分，這顯然是不合事實的議論。事實上男子也有煩悶。我們只要留心報紙，每天可以看到許多實例：有的心裏想入學繼續讀書，但因為家裏貧窮，沒有錢，母親勸他就業。他很想讀書，但一方面也顧慮家景和覺得不便違背母親的意思，因此就非常煩悶。有的因為有女朋友要嫁他，但是他的家庭不贊成，究竟還是寧可和家庭鬧僵，決計娶她好呢？還是順從家庭的意見，和女朋友慢慢疏淡好。一時解決不下，也覺得非常煩悶。有的愛國的心非常熱烈，非常想去救國工作，為了民族解放，便是犧牲生命也所不惜的。但是家裏的人疼愛他，不肯讓他去做。家庭裏的人雖然不懂道理，或者說「不明大義」，但是對於他個人總像並非惡意，因此還是決絕走好呢？還是順從家庭的要求，打消類乎赴前線的冒險的念頭，改做些只求有益於社會的安全的事情也可以呢？二種想頭衝突着，無法解決，使他煩

悶。諸如此類的煩悶，多到說不盡。

在物價便宜的時候，有些講究的舞廳，每餐已需要十五元一客。馬路小工吃的是一團冷飯，幾粒黃豆。在物價長高，許多人生活十分困難，連黃豆都沒得吃的時候，大華電影院映亂世佳人，聞說有人去定八元的座位，三天以前已經定不到。有些人錢太多，太沒有事情做，專門尋消遣。有些人整天做事還窮得不能生活。有些人想做事，但沒有事情可做，祇好自殺。這是窮苦和奢侈的兩極端的對比。在許多人想做事沒有事情可做，許多人本來是在做事的，但忽然會被擠出到職業圈之外去，變成失業者，這樣的社會裏，使許多人，常常要苦悶，也是必然的事情。當抄寫的整天的替人家抄寫，當文牘的整天替人家寫信，做公文。這些事情，對於他自己是毫無興趣的。做裁縫的整天替人家做衣服。打獵的整日整年的打獵，捕魚的整年的捕魚，做釘子的整天做釘子。

作工的時間既長，工作又辛苦，所得的報酬却很少，生活得極壞。俗語說「吃一行，怨一行，」可見有職業做事情的人，自來多煩悶。他既然怨本行做的事，為什麼不改行做別的事情呢？原來在舊社會裏，社會上實在有着一種壓迫，把你壓迫住，使你動不得，不能改行業。的確的，改換一種行業是很困難的事情。除非在新的社會裏，你不喜歡做這種工作時，可以去做那種工作。在舊社會裏是難能的。但是有人會得問：農民不是可以搬到都市裏去做工嗎？江北人也可



以到上海去拉黃包車哩？這的確是事實。他們在農村裏被擠出來後，到都市去找一些費力多而所得少的事情做。這一點移動性是有的。但他找到這工作後，又嵌住在那裏了，仍然「吃一行，怨一行」，口裏叫苦。這一批人常常在苦悶，是明明白白的事實。我們大抵可以看來，人們很容易發生苦悶，苦悶的原因也很多，要是長久做一種工作，特別是肉體過勞，或前途沒有什麼希望的，便會發生苦悶。發生苦悶的並不限於女性。

苦悶不僅僅是一種精神上的苦痛，停止於這種苦痛的。它可以漸漸向絕望的方面轉移。但也可以從另一方面轉移，找尋一個出路，改造一切他所能夠改造的，破壞或建造一切他所可能的。因此在統治者看起來，發生苦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他們對於「安分守己」的提倡，目的是在叫人滿足眼前的生活情況，不要「胡思亂想」，也不要苦悶，免得爲了找尋出路，鬧亂子。叫人安分守己是比較舊的方法，還有一種舊方法是壓抑和否認人要求。社會學家都說人是社會造出來的，但同時他又有他的獨自性。他究竟和別一種社會造出來的東西，比方鋼的機器不相同。他要營養，眠睡，娛樂等等，如果缺乏營養，過於疲勞，過於憂慮，苦悶，他就會於短時期內死去，不像機器的經久。因爲他的生理有一個限度，過這限度他就不堪負擔了。記得卡爾在資本論第一冊裏說歐洲以維持個人及子女的生活爲定工資的標準，這還是資本主義初興起來，又已經有了一些科學知識的時代的辦法，到沒落時期還要兇起來。

至於我國是封建得很厲害的國家，有些人把人生還不當他是血肉的人身看，生理學的地看，還把人當作封神傳的「人」的看法，常常有法術似的，不大會死的，所以作工不妨苦，工資不妨少。好在失業的人很多，死了可以另外換一批來補充的，實際上也不會感到困難。如果單知道社會造人，而不注意人的獨自性，這說法，結果是有害的。不糾正把人看作非生理的人生之錯誤，實際上幫助把人當作機器待遇的辦法。

#### 四

上面雖說使個人發生苦悶有許多許多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却分明是政治的壓迫。舊戲裏一面常常說「思想起來好不煩悶人也。」另一方面也常常說：「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我國君主時代的黑暗和壓迫之厲害是盡人皆知的。是一件小事情，人們常常被指定犯罪，真是動輒得咎。「思想起來」雖然不一定是思想政治上的黑暗，可是政治黑暗和壓迫，在在叫人「煩悶」，這是無可疑惑的。比方，近來有些地方的青年常常叫着苦悶，其中原因也許很多，可是同時又看到出版，言論的不自由，開會結社的不自由的事實，和聽到有些青年被捕去；並且不知捕到那裏去了，後來甚至音信也沒有了的消息。有些竟不知怎的，竟忽然死掉了。分明青年的苦悶和這種言論，出版，開會，結社的不自由，以及捉人，殺人的事實結合着，我們很有理由相信青



年們的苦悶的主要原因是和這些事情有關係，換一句話，是和政治的壓迫，不民主有關係。

大家都知道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舊國家。現在還有許多活着的人是科舉時代生長起來的，他們看見過真正老牌的封建社會的情形。後來雖然進步很快，經過幾次的革命，今日有些情形已不能和昔日相比較，但封建的舊辦法還保留着很多。這是事實。還有一個事實是因為中國落後得很遠，中國還在封建的夢裏的時候，西洋所謂「先進國家」早已早已興起資本主義來了。由新興而繁榮，過了一個時期，又趨於沒落。等到中國——先前一個時期有一部分人想學他們時，他們已經發展，已經天羅地網的罩住了中國，像中國帶封建的，技術落後的，資本落後的這一點點事業，當然不能夠和他們競爭。很容易便被他們壓下去。因此已不必學他們，應該另尋一條出路了。學他們的辦法已經走不通。後來有一個時期，又有一部分人想學他們，他們實在已到了將要完結的時期，他們比先前更其兇橫和殘暴了。

當然更其不應該再去學他們，應當另找出路以謀發展和進步。換一句話，爲了中國的前途，祇要稍微有一點好心的人大概都知道的，像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國家，要謀生存和進步，一點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取比所謂「先進國家」更進一步的辦法，即走社會主義的，在現在，也即我民主主義的道路。否則不但永遠跟不上，而且還要遭受打擊，和被顛覆。物力，人力白費了且不去說他，實際上是削弱了真正進步的力量了。

政治上已經應該那樣做，如果不照那樣做，便要發生許多矛盾，衝突，和碰壁。在這種情形之下。前進一點的青年便要發生苦悶，即使有些人並不意識到自己爲什麼發生苦悶的。這是青年發生苦悶的大原因。

## 五

但是，如果說壓迫或不自由，青年便都要苦悶，却也不盡然。我們明明看到還有些青年，却並不苦悶。他們努力着在做各種事情，有時雖憤怒，有時也歡笑，但不憂愁，不苦悶。這些青年改革家並不是不思想，當然常常思想，並且時時刻刻思想，計劃怎麼樣做，中國可以不止，人民可以從重重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研究怎麼樣做，中國人民可以走上光明的路。使它向進步的方向走去，不要再誤入歧途。不過這思想，不祇是在腦中構成一個圖案，便算完事，便又立刻又想到別處去了。他們是想和做連在一起的，不相分離的。因此我們實有理由可以相信，苦悶的青年，固然常常是進步的青年，但多般還在想而沒有決定究竟應該怎麼樣做才對的時候。現在我又想到另外一個問題，有許多人對於無論社會主義或什麼主義這一名辭之下，第一件事情實在只是做，便是把大家從重重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至於將來的社會裏吃些什麼，穿什麼衣裳，睡的是什麼床，倒是不暇顧及的，別有些人便不然了，多般是空想較多的智識分子，他們如聽到社會主



義或相似的一個名辭，他首先要知道的是這樣一種主義的社會是怎麼樣一種社會，吃的是什麼，穿的是什麼，特別要知道的是像他這樣的一個人，在那種社會之下，生活的利益是否能夠優厚些。須要經過詳細的比較之後，才能決定贊成還是反對的態度。歐美寫了好些描寫社會主義社會是怎麼樣一種社會的書，我想大概便是給這樣一班智識分子看的吧？但這一種決定並不是容易的事情，情形天天變化着，決定愈爲難了。如果延長下去，他也會煩悶的。

現在再回過來說青年的苦悶，他們大都是進步的青年，祇因爲他們一時不能決定究竟怎樣做，所以苦悶着，一旦決定後，便會不苦悶。

## 六

別一方面，頹廢的人們倒往往不苦悶的。他們做事往往倒行逆施，他們向既定的方法一逕做下去，到最後爲止。這宗例子，到處都是。講得遠點，帝國主義國家的老大哥英吉利的有些人，實在培植過德國和日本的勢力。他們是最一貫，最堅決反對新興革命勢力的一派，也多陰謀和詭計。但是饒你狡猾到怎麼地步，終於料不到本來預備禍人的，却「自食其果」了。但他總學托爾斯太的大度，對於打擊，總以一笑了之的。到了號稱一國最高威權的代表之大使，被從汽車裏炸出來，再用機關槍的子彈鬧鬧地從背上插進去的時候有些狼狽了，打得淋淋丁丁。這說是優

待，不會有人相信的吧？但是還是笑，雖然有些苦笑。本來想指使去打擊蘇聯的德國的炸彈，現在分明已炸到張伯倫這些傢伙的頭上了。

將沒落的帝國主義者們，和落後國家的封建主義者，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上的賣辦階級，也是這樣，將沒落之先，理智和感情先沒落，破產。他們祇知道賂買，誘惑，恐嚇，壓迫，逞兇；所用的手段是陰謀，詭計，狡詐，欺騙，以損人利己，或只是損人，於己無利的也做。（但陰謀，詭計，是不能從全部行動中分離出來獨立斷定的。比方，用一種相似的方法或手段，用在益於解放，及摧毀壓迫的事情或目的上，便成爲一種計策或策略；如果用在反進步性的，自私壓迫等，便是非理智的陰謀等。）

智慧的末落，變態，惡化，是這一派人們將要末落，破產的表示的頂明顯的預兆，使他們發生這些預兆的，還有許多物質的基本原因和條件，但粗看起來，和不向多方面觀察，沒有這麼眼瞭罷了。

註：前面幾次引用舊戲裏的話。我把舊戲看作是實際生活的描寫和扮演，雖然多少變化過了，或漫寫了的。這本來沒有說明的必要。但有許多中國人的確不是這樣看法，他們認爲實際生活也就是做戲。他們把戲看作是正本，實際生活倒是副本。這種概念實在是有害的。養成這種思想的原因之一，大概因爲看了過去官場中人物的太滑稽，太遊戲，和不負責任了，所以覺得他們不像在做人或做官，實在像在做戲。北洋軍閥專政時候的官僚政客們的虛偽作假，作惡卑鄙，滑稽可笑，真的不像在真真實實的做人。（其實直到現在，



求知在本輯提供了兩篇重要的國際問題的文章，而且都以蘇聯為其研究的對象。第一篇是阿平先生的日蘇關係前途如何，這是目下誰都關心的一個問題，作者在本文中，由日蘇兩個國家的不同性質說到兩國關係的特質，兩國關係變化的原因，兩國關係發展的幾個階段，然後進一步分析兩國改善關係的可能性，而得到日蘇關係可能改善並可能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的結論。本文層次分明，材料豐富，而且文字十分通俗，但我們覺得，作者在第三節與第十節的說明，確有值得展開討論的地方，特別是關於日蘇可能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一點，我們認為阿平先生這結論是十分大膽的。現在我們已約好別的一二位作者，在下期展開一個討論，希望讀者注意。

另一篇是希伯先生的蘇聯外交政策的史的檢討，立論十分精警。讀完了這篇文章，就可以明白蘇聯二十年來的外交政策，都有一貫的立場與堅定的主張。當日德義三國同盟成立之後，國內對蘇聯今後動向異常關心的時候，希伯先生這篇文章，便在本問題上給予一個正確的解答。

最後是徐喬先生的論青年的苦悶。作者明確地指出現代中國青年的苦悶，並非僅限於戀愛與生活的受壓迫，主要的還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政治的又民主與封建殘餘對青年的壓迫，是中國最大多數青年的苦悶的來源作者對青年應如何擺脫苦悶的指示，很為正確；即應該有進步的思想，擺脫空想注意實踐，以實際的行動來擺脫苦悶和推翻苦悶的根源。

因為日蘇關係論的篇幅過多，有二篇文章只能留待下期發表了。